



西安地方志

2014·第6期

(总第231期)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目 录

历代名人与西安

吉备真备——两次担任遣唐使的日本学者
和政治家 (3)

学术交流

“三天之内用事实答复你们” 封五昌 (5)

人物春秋

功过是非李林荣 孙兴盛 (8)

史料钩沉

《明怀远将军西渠周先生墓铭》考
..... 景浩学 (11)

三次落榜的古代名人 (14)

两岸关系经历的“数字时代” (16)

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的战略远见 (18)

西安风情

西安城门趣闻(八)——玉祥门 (20)

西安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大雁塔
..... (22)

我们的村落

白家口村 (24)

北火巷村 (25)

红庙坡村 (26)

纸坊村 (27)

丰禾村 (28)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中华老字号春发生葫芦头泡馍系列制作技艺
..... 乌云高娃(整理) (29)

文史拾趣

- 谈古论今说贪官 (31)
李鸿章的外交笑话 (33)
中国领导人的“国货”情结 (36)
唐太宗与“钓鱼执法” (37)

志鉴动态

- 西安市地方志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40)
2014年《西安年鉴》培训会议召开 (40)
《西安地方志编纂志》评审会议召开 (41)
《西安年鉴(2014)》出版发行 (41)
《西安市志》“检察”分篇评审会召开 (42)
《至圣牛东——牛东村志》正式出版发行 (42)

知识窗

- “以人为本”最早是谁提出来的 (43)
猴年马月确实难等 (43)
古人的陪客之道 (44)
西安市辖县中最悠久的县 (44)
西安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44)
古代官员的探亲假 (45)
“压轴”并非“结尾” (45)

历代诗人咏长安

- 子夜吴歌·冬歌 (唐)李白 (46)

解字

- “助” (23)
“劲” (35)

名句欣赏

- 【义利利义相为用】等五句 (39)

文苑

- 青山见我 田周民 (47)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员: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张 耀 高 鹏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高长安 宋亚颖

责任编辑:何彩云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109号市政府
大院26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www.xadqw.cn/difangzhinew/
index.jsp](http://www.xadqw.cn/difangzhinew/index.jsp)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吉备真备纪念碑园位于大南门东侧环城公园(原唐国子监遗址)

吉备真备 ——两次担任遣唐使的日本学者和政治家

吉备真备(693—775),原名下道真备,因功赐姓吉备,所以一般称吉备真备。后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政治家,曾两次任遣唐使,官至正二位右大臣,明治时期被迫赠为勋二等。

公元693年,吉备真备出生于一个小官吏之家,父亲国胜,是一个右卫士少尉小官。吉备真备出身虽然不高,但自幼潜心研究汉学,为日后成为日本人唐留学生打下了良好基础。公元717年,吉备真备随第七次遣唐使赴唐,入长安朝拜、交流。在鸿胪寺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赵玄默,唐国子监老师。曾与群臣向玄宗献诗,皇帝赐予赵玄默的赞辞为:“赵玄默才比丘明,学兼儒墨,叙述委婉,讲论道德”。当时与尹知章、范行恭等齐名,号为“名儒”)。

在唐交流近17年,吉备真备潜心研究唐代的天文、历法、音乐、法律、兵法、建筑等知

识,各方面均有较深造诣。与此同时,还考察长安的建筑,了解长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使自己的社会经验也得以提高。

公元733年8月,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来到长安。这时的吉备真备已经是一位身通六艺(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本法)的饱学之士,于是决定随遣唐使回国。在完成各项任务之后,公元734年,遣唐使启程回日本。与以往的遣唐使一样,他们的归途并不顺利,一度漂流到了种子岛。

公元735年,吉备真备终于携带了众多的典籍随遣唐使回到日本。向天皇献上了书籍(《唐礼》130卷)、天文历书(《大衍历经》1卷和《大衍历立成》12卷)、日時計(测影铁尺)、乐器(铜律管、铁如方响、写律管声12条)、音乐书(《乐书要录》10卷)、弓(弦缠漆角弓、马上饮水漆角弓、露面漆四节角弓各1张)、矢

● 历代名人与西安 ●

(射弓箭 20 只和平射箭 10 只)等文化典籍和器物。并带回了《东观汉记》，该书为记载东汉光武帝至灵帝一段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范晔《后汉书》问世前，该书影响较大，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

吉备真备带回的《唐礼》对日本朝廷礼仪的完善和改进有很大影响，《太衍历经》《太衍历立成》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使唐代历法得以在日本推广和使用。带回的乐器和乐书对于唐乐在日本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带回的《乐书要录》，中国早已失传，现仍在日本保存，成为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资料。随后，他被任命为大学助教。当时日本的大学设有明经、文章、明法、算学、音韵、书法六科，学生有四五百人，吉备真备为六科的学生讲授学自中国的各种新知识，教读《史记》《汉书》《后汉书》，甚至高野天皇也跟他学习《礼记》《汉书》。与此同时，吉备真备参与了日本的许多政治活动。

吉备真备受长安文化的影响，产生了浓厚的长安情结。令当时许多长安人意外的是，公元 752 年吉备真备又以遣唐使副使身份随藤原清河大使再次赴唐。使团到达长安后，得到唐玄宗的接见，并赠吉备真备银青光禄大夫称号，离开长安时玄宗还赠诗相送。此间，吉备真备还与阿倍仲麻吕会面、交流。使团在返回途中，于公元 753 年 10 月至扬州拜访著名高僧鉴真，对其东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返回途中，受风暴的影响，又漂流到了屋久岛。经过一番周折，最终和大唐鉴真大师一起

平安地回到了日本。

公元 754 年归国后，吉备真备任大宰大贰，后又升右大臣，公元 771 年退隐。任右大臣期间，参照《唐律》等中国法律删定了《养老律令》，对日本影响深远。

对于日本文化传承，吉备真备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是根据部分汉字偏旁部首创制了日语片假名。这些汉字共 50 个，被称为“母字”。古代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利用汉字做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称为“万叶假名”。后来，留学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使日本文化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吉备真备著有《私教类聚》《道弱和上纂》《删定律令》等。据传，中国的围棋也由吉备真备带往日本。他还与草圣张旭交流过书法，回到日本后，弘扬了大晋、大唐的书法之道。

时间已经过去 1200 多年，但是日本人民和西安人民并没有忘记吉备真备。为纪念吉备真备，井原铁道的井原线在其故乡、冈山县吉备郡真备町的箭田设有同名车站，奈良市内的奈良教育大学之中据说有吉备真备墓。1986 年，为了纪念吉备真备携带唐朝典籍回国 1250 年，中日双方共同修建了吉备真备纪念碑。不仅记录了其伟大的功绩，也成为中日两国人民长久友谊的历史见证。1988 年，日本在其故乡冈山县真备町，建造了充溢着浓郁唐代情调的“真备公园”。

今日西安，与日本奈良、京都等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吉备真备成为无形的桥梁。



“三天之内用事实答复你们”

——张学良劝阻游行学生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所讲的话

◎ 封五昌

长期以来,关于“西安事变”前三天(即1936年12月9日),张学良将军劝阻游行学生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的讲话,大多是这样记述的。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合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中写道:“游行大队又向临潼华清池进发,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闻讯后,立即电令张学良,要他严加制止,不准学生到华清池来,否则即派军队镇压。张接电话后,怕学生受害,亲自驾汽车追到十里铺,劝学生回西安,学生再三不肯。……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也大受感动,他最后向学生表示:‘……我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

一周之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请你们今天回去。我不欺骗同学,如果逾期欺骗你们,我愿意你们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学生们见张学良态度诚恳,遂接受了张的要求返回西安。”(见该书第269~270页)

再如,《中国现代史常识》(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中写道:“……张学良放下电话,立即驾车赶到灞桥追上了学生队伍。他劝学生千万不要去临潼,以免遭受屠杀。学生们向张学良哭诉了亡国亡家之痛,说现在国难当头,愿以死救国。接着,一万多学生放声痛哭,张学良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他擦去自己脸上的热泪,向学生们说:你们的要求,我在一个礼拜之内用事实来答复。”(见该书第381页)

●学术交流●

另外,甚至包括一些专家、学者的论著中,也多持上述说法,恕不一一列举。

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西安市民盟文史资料委员会开会讨论关于文史资料的编写工作,会上有人发言称:现在的文史资料已无什么可写的了,因为写过来写过去还就是那几件事,没啥意思。这时,主持会议的刘纪光先生说道:话不能这样讲,文史资料还有发掘的余地,比如,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将军对游行学生的讲话,很多人写文章说是“七天之内,我用事实答复你们”,其实并非如此。张学良讲话时,我就在请愿学生队伍中,听得清清楚楚。当时,张学良将军对学生讲到(刘纪光先生多才多艺,他模仿张学良的东北口音惟妙惟肖):“同学们,我张学良是国民革命军的副总司令,不是蒋委员长的走卒,我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今天先回去,我保证在三天之内,用事实答复你们。”刘纪光先生还说道,当时张学良将军举起右手,掐了三个指头,怎么会是“七天”或者“一周”呢?后人不知就里,或年代久远,记忆有误,或人云亦云,陈陈相因。写文史资料一定要实事求是,这种背离史实与真相不符的记载,将会影响视听,予世人以错觉。

刘老的一席话,对我有很大启发。为此,我专门访问了我的老师黄云兴先生。西安事变前后,他正在西安高中上学,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西安学生立即响应,为了扩大宣传面,西安高中学生救国会创办了救亡刊物《救亡线》,其主编就是黄云兴先生,他参加了“西安事变”前三天的请愿游行。当我向他转述了刘纪光先生的谈话后,他说,刘纪光说的对着呢,张学良当时的确说的是

“三天内”。

接着,黄老师向我追述起当日的情况。1936年12月9日,西安各校学生在“学联”领导下纪念北平学生南下请愿一周年,赴当时的“剿总”、陕西省政府和西安绥靖公署请愿。由于均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大家决定奔赴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队伍本欲出火车站“中正门”(今称解放门),但早有军队把守,城门关闭。于是改道出“中山门”(小东门),守卫士兵是东北军(电影《西安事变》中“演义”为说陕西话的西北军,失实),并未阻挡学生,大家很快抬下门杠,一涌而出。大约在当天下午4点,队伍向东行至离城五六里的“万子营”、苗圃(现胡家庙以东)时,我们回头看见一辆黑色小轿车飞驰而来,戛然停车,随即有两个穿便衣的人跳下车来,我一看其一是张学良将军,跟着下来的是王以哲军长。张学良将军非常着急地招手喊道:“赶快回来,我有重要话给大家讲”。紧接着,他又给队伍后面的同学说:“传我的话,后队变前队,前队变后队在这里集合!”大家看到张将军焦急的神情,在迟疑中掉转队伍。接着张将军和王军长走上路南边麦地里的一个大冢上,招手叫大家围拢过来。他大声向同学们喊话:“同学们,不要去临潼了,我有重要话给大家讲。”这时队伍中骚动开了,只听有人高声喊道:“大家不要听他的阻拦,他把东三省都送给了日本,跑到西北来打内战,不听他的谎话!”还有人喊道:“我们不当亡国奴!”张将军听到后激愤极了,他沉痛地说:“你们的要求,也是我的要求,我张学良是愿意抗日的,也是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我国仇家恨集于一身,请大家相信我,我给大家当代表向委员长请愿。”这

时又有人喊道：“不相信，不要哄骗我们回去！”张将军听了后更加激愤，大声讲道：“请大家相信，三天之内用事实答复你们！”这时，由北京来西安参加学运的宋黎上到大家上说：“我们相信张副司令的话，天快黑了，大家回去吧。”同学们听后才陆续走回学校，一路上还在议论着“三天之内用事实答复”的话。后来，果然“双十二”事变爆发，刚好是三天，大家才恍然大悟。

黄老师讲完经过，又说：当时张学良将军的豪言壮语我听得清清楚楚，他在情急之下，不加考虑地说出先一天（12月8日）与杨虎城将军密商决定“双十二”进行“兵谏”的事。并说：关于这次大请愿的记述中，有人把“三天之内”记为“一周之内”或“七天之内”，可能错记或以为张将军有意对自己的承诺留有余地，而忽略了张将军在激愤中发自肺腑的真言。

临别，黄老师还送我一本《碑林文史资料》（第八辑，1993年12月第1版），内有当年在西安高中上学的赵廷杰先生写的题为《回忆西安事变》一文，写道：请愿大军……行至西安东郊苗圃附近，……张学良由西安驱车赶到，派人叫学生集合，他要讲话。他说：大家意见我一定转达委员长，如果蒋采纳，我一定出师抗日，个人名利在所不计；如蒋拒绝采纳，我有两条途径：一是下野不干（另一条他没有说），保证三天内，给大家用事实答复，请大家相信我张学良，赶快回去，前边障碍重重（暗示前面已支起机关枪），再前进就有生命危险。张学良慷慨陈词，语重心长，大家深受感动，同意返回。待请愿大军回到城内，天色已黑。对张所说第二条途径究竟是什么，大家

都陷入了深沉的思考之中……

12月12日黎明，……早上八时左右，有一汽车送来大批传单，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抢着看。上边用套红大标题写着：张副司令、杨主任对委员长实行兵谏，并提出八大主张……同学们顿时欢腾起来，欢呼“一二·九”请愿的胜利，张副司令的诺言实现了，张副司令讲话之谜解开了。（见该书第12~13页）

综上所述，刘纪光、黄云兴、赵廷杰诸先生，均是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抗日游行请愿活动的亲历者，他们的回忆，尽管有个别细节不太一致，但对张学良将军对游行学生讲话中所答应的“三天内，用事实答复你们！”却是一致的；很多材料所记“七天内”或“一周内”云云，乃是误记、误传。再者，张将军讲话时的地点，既非“十里铺”，更非“灞桥”（黄老师告诉我，你想我们学生一两万人，是步行呢，而张学良乘坐的是小汽车，我们根本未走到灞桥，更不用说灞桥了。张将军讲话时，我就站在他跟前，向南一望，能看到韩森冢）。

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的请愿游行，可以说是“双十二”事变的序幕，意义不可低估。距今已近80年，当时实况（包括细节）有记录出来的必要，以免年代久远，辗转讹讹。现在就我所了解的有关张学良当年的讲话，记录出来，以供研究这段历史的参考。

注：刘纪光先生生前曾担任民盟雁塔区工委主委、雁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云兴先生，民进会员，生前系西安市21中学语文教师。

（作者封五昌，退休前系西安市教育局教研室历史教研员。）

志主世系表

周宗—周鼎—周玘—周玺—周堂—周西渠—周启

(一)志主怀远将军周西渠

志主为明朝嘉靖年间怀远将军周西渠，志文言周西渠：“公讳道，字一山，”生于明成化乙丑年(1469)。志文中对怀远将军七代先祖世袭明朝军职作了记述，其继承祖辈军职，“缙而袭荫”。称其“性颖敏，驍然超众，专精业儒。”可见其是位文武双全的将军。

怀远将军世袭军职，有爱国守土之志。明弘治年间，蒙古鞑靼部的达延汗(明朝称之为小王子)统一了蒙古各部，势力大增，对明政权造成威胁。明弘治十四年(1501)“小王子”“以十万骑从花马池、盐池入，散掠固原、宁夏境，三辅震动，戕杀残酷”。①志文中称：怀远将军“时遇西夏之变，讨贼报捷。”

怀远将军时值三十而立之年，英勇无畏地率领明军奔袭在河西走廊，向窜入固原、宁夏境内的“小王子”部展开拼杀激战。在此次“西夏之变”中，“讨贼报捷”，立下战功，受到朝廷嘉奖，志文称其受到“钦赐金币，抚监嘉其忠勇”。作为镇守西北的将军，商洛古峽关东南要塞，是其统辖的重要区域。志文中称：“闻君雄道，望风披靡”，使贼寇“不敢越境，士民时而无恐，”国泰民安，“关内诸公闻其贤，乃题‘文武联晖’扁，旌其门”。

怀远将军于“嘉靖庚子秋(1540)九月二十之三日以疾卒，得寿七十有三”。从志文中可知，怀远将军之死，受到朝廷和西安府的重视，其志文篆刻有明朝工部、吏部官员参与，志文落款为“西安秦政大夫工部员外郎吏部郎中子午山人”。

(二)志主先祖周宗

怀远将军周西渠“其先祖隶广陵郡江都

人，”即今江苏省扬州市。志文称：“始祖讳宗”，乃周宗：“作战屡捷有功，选充钱塘总旗，”“于洪武初年，调发钱塘，仍以原职，随征，所过巍然。”洪武元年(1368)三月，朱元璋命徐达实施“旋师河南”。四月，徐达大军西下河南府(洛阳)，大败元军于洛水北。志文中称周宗“以原职随征，所过巍然。”应是随徐达将军实施朱元璋的“旋师河南”的对元作战计划。在推翻元朝统治，攻克元大都中，作为明军中的钱塘总旗之职的周宗，其“随征，”且“所过巍然”，英勇作战，为灭元扶明建立功业。

洪武二年(1369)三月，在徐达大将军统领下，常遇春、冯宗异率军由山西攻入陕西奉元路。志文称周宗“向陕授延安百户，寻升西安中护卫前所付千户，承护西安前卫，中升世袭。”周宗在随明军由山西入陕西，占领延安，进攻陕西奉元路(西安)作战中，屡战有功，方获取“延安百户”、“西安中护卫前所付千户”之位。

(三)志主曾祖周玘

志文言：“宗生高祖鼎，荫袭本职。鼎生曾祖玘，荫袭”。周玘乃怀远将军的曾祖父，志文言其于明永乐年间，随驾亲征东北二路。明永乐七年(1409)秋，明成祖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率精骑十万北征蒙古鞑靼部，在胘胸河(今克鲁伦河)大败，“全军覆没”，丘福及诸将皆被杀害，“帝震怒，以诸将无足任者，决计亲征”。志文称：周玘奉“天子命之建旗辕门，带甲数万铁骑，云飞越，如风发攻如河凌”。

在明成祖亲自率领下，明军大败本雅失里于斡难河(今鄂嫩河)上。接着，明军回师东击阿鲁台部于飞云壑，阿鲁台部大败。至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先后五次御驾亲征，与反叛的蒙古部落展开激战，明军大胜，蒙古部落大败。在五次北征中，周玘率明军奋勇杀敌，作战有功，“升正千户”。周玘的英名

在嘉靖惟扬卷十九中亦有记载。

为巩固明朝北疆,确保明都北京安澜,周玘“奉天子之命,建旗辕门。”据从河北迁安县志获取的相关资料,该辕门位于明长城喜峰口所在的迁安县境内。周玘长期镇守明长城喜峰口关隘,其子周玺在迁安长大成人,明史《周玺传》载:周玘死后,其子周玺继袭其职。

(四)志主祖父周玺

志文言“玘生祖玺,荫袭,如其官”。玺乃怀远将军的祖父。明史《周玺传》言:明成化十六年(1480),周玺“从王越征威宁海子,累进都指挥使”。“成化十八年(1482)玺进署都督僉事,迁大同副总兵”。成化十九年(1483)“大同总兵刘宁遣玺守怀仁,玺闻中军失利,厉将士曰:‘今日有进无退’大呼陷阵允之,短兵接,玺臂中流矢,拔镞战益急,与子鹏及麾下壮士击杀数十人。”“玺以功予实授,玺寻以右副总兵分守代州”。弘治初年(1488),奉朝廷之命,周玺迁镇陕西,任陕西镇守总兵,亲自指挥“讨平扶风诸县附籍回回”。弘治三年(1490),周玺“佩征西将军印,镇守宁夏,甫一岁卒。且死,召诸子曰‘吾佩印分阃,分已足,独未尝大破敌,恨抱恨入地矣’连呼‘杀贼’而瞑,子鹏累官锦衣卫指挥僉事”。②

志文言:周玺“屡因征剿有功,升本卫指挥僉事,后因控变称强,兵鲜,弗敌力战,死之”。其为保卫大明王朝江山,镇守西北边陲,为使国泰民安而故。

(五)墓铭相关问题考述

志文言:“玺生父堂,荫袭前职”。堂乃周玺之子,怀远将军之父。“堂以骁维之姿,挺持之才,推司卫印”。周堂因“先世冲锋歿于军,拟奏加升指挥同知”。按照明朝军队世袭制度和先辈的功劳,周堂在明军中的职位和官位高于其父周玺。据明史专家研究确认,周玺在

明朝官居四品,周堂官居从三品。怀远将军荫袭父职,且在镇守西北,捍卫大明江山中立有战功,其官从三品。

从志文中可知,怀远将军之父周堂青年时文武双全,是世袭军职中的将军,“推司卫印,纬有能授”,不仅持将军印,而且对儒学造诣深,可讲授经学。但在周西渠青年之时,其因病在家治患,难以率军杀贼立功,故在志文中对其军功未加记述。

关于怀远将军之子周启,志文中对其也作了较高的评价,称周启“能通武经诸书,且精射为奇。袭荫”显然,其承继祖辈、父辈的德与能,是位文武双全的人。墓志铭中记述,在怀远将军“疾卒”之前,周启已亡。因何死于父之前,志文中也作了简言:“其负气将衰”,因何气,不得而知。

从志文中还可以追证两事:一为封建社会在婚姻上讲究“门当户对”。志文言:怀远将军“始发于德,生子启,妻亡继娶刘氏,后卫指挥堂之女”。显然,怀远将军作为将门之第,继娶后卫指挥堂之女为妻,是门当户对的。二是明朝实行世袭制,延续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传统。怀远将军七代世袭军职。从志文中可知,在怀远将军死前,其子已亡,由谁来“荫袭本职”,志文言:“表见嘉靖”,“其孙荫袭本职,公议获准”。显然,在怀远将军逝世前,其孙已“荫袭本职”。说明封建社会的世袭制度始终坚持着。

明嘉靖庚子年(1540)《明怀远将军西渠周先生墓铭》,于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西安市东郊韩森寨。时因修建军工企业国营秦川机械厂,占地约百亩的明嘉靖年间镇国将军周西渠墓地易为厂区,墓地牌楼及石碑、石武官人、石马、石狮等地面文物被拆除。墓室挖掘后,墓铭被守墓家族后人收藏。20世纪90

●史料钩沉●

年代，居住怀远将军后裔的西安市西郊周家寨、周家河湾村、黄堆村周姓家族的一些人先后在韩森寨目睹该碑。至2014年2月，四个村周姓家族集中举办了4次祭祖活动。为考证墓铭内容，笔者曾到怀远将军祖籍江苏省扬州市和江都市档案局翻阅明史资料，并在当地民间走访，且在陕西省地方志资料室、陕西省图书馆获得部分有价值的资料，在将军后裔的4个村庄中调研，并前往怀远将军曾镇守商洛的古峪关、武关进行实地考察，与河北省迁西县、迁安县地方志办公室联系，将获得的资料进行研究整理，使该墓铭得到考证。

《明怀远将军西渠周先生墓铭》记述了怀远将军生平事迹，追述了其家七代先祖在创立和维护明王朝江山中的战绩，既是一部辉煌的家史，也是明史部分的缩影。

注释：

①《中国历史·明史》傅衣凌主编，杨国楨、陈支平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162页；

②中华民国迁安县志《周玺传》。《陕西通志》(明)赵廷瑞修，马理撰，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明史·刘宁传》附周玺传。

(作者1948年生于西安市雁塔区鱼化街办周家村，退休前为媒体人，从事明怀远将军家史研究已有十余年。)

三次落榜的古代名人

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考场如战场，有人春风得意马蹄疾，自然也有人愁云惨淡万里凝。多位历史名人都曾三度名落孙山。

韩愈：接连应考霉运多

被苏轼评为“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的韩愈，从20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一连失败三次。

公元787年，韩愈在取得乡贡资格后，前往长安，应礼部进士试，但这次考试失败了。接着，他又考了两次，均名落孙山。这对韩愈打击很大，他感到愧对祖先、愧对家人。韩愈把前人写的文章都吃透了，但他的写作方法不讨主考官的喜欢，譬如第三次考进士，出的试题为“不迁怒不贰过”，大意是“若自己不高兴，不要转移到别人身上，不犯两次同样的错误”。韩愈看后，立即有了主题，他没有用骈体，而是用古文体挥笔而就，写得很顺利，但主考官看了以后，却像废纸一样扔在一边。

公元792年，韩愈再次来到长安，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这一次，主考官是宰相陆贽，试题和上年的差不多。韩愈没有犹豫，一字不改地把去年的旧作写在卷面上，很快交卷了。陆贽看后，感到此卷似曾相识，反复看了几遍，自语道：“好文章！完全是古文风格，没有半点骈体文的味道，去年怎么没有录取？差点埋没人才了！”就这样，韩愈考中了进士。

其实，韩愈这次考上进士，也与其他考官梁肃、王础有关。梁、王此次辅助主考官陆贽，两人都爱好

古文,都欣赏韩愈,都有提携韩愈之意。所以,韩愈 25 岁考上进士,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考取进士并不等于有官可做,这只是入仕的第一步。礼部只管进士,派官还要经过吏部的“守选”考试,其考试名目多,普通的是“书判拔萃”,入高官的是“博学宏辞”。韩愈心想自己满腹经纶,考“博学宏辞”不会有什么问题。谁知,与当年考进士的命运一样,连续三年,均一败涂地。

无奈,他只得另辟蹊径。两个月内给当朝宰相写出三封情真意切、辞藻华丽的陈述书。说自己“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请求垂怜一官半职。结果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于是,他不得已而求其次,投奔地方军阀。可只干了两年多,幕主便死了;之后又投奔了一个军阀,还没上任,幕主又去世了。韩愈真是霉运多多,可谓“靠山山倒,靠水水流”。

幸运的是,韩愈的《进学解》被当时的宰相看到,惊叹不已,很同情他的遭遇,也欣赏他的才干,于是任命韩愈为五品刑部比部郎中兼任史馆修撰,韩愈从此进入高官阶层。

李时珍:落榜后改学医

从 6 岁读书开始,李时珍便显露出聪明才智。1532 年刚刚 14 岁的李时珍中了秀才,这给父亲李言闻带来了莫大的期盼。然而在当时的社会,中举人何等之难,李时珍连续参加了三次科举考试,第二次还由于过度的用功和劳累得了骨蒸病,连续高烧不退,险些丢了性命。

两次落榜后,李时珍依然在科举路上艰难跋涉,集中一切精力希望能顺利通过科举考试。明嘉靖十九年(1540),23 岁的李时珍第

三次落榜。李时珍父子都对科举制度心灰意冷,李时珍无奈抛下了八股文,转而学医。

不到 4 年时间,李时珍成为了一名有独立行医能力的医生,而且名气越来越大。此时,湖北楚王的世子突然得了暴厥症,俗称抽风,找了很多医生都没有治好。楚王很着急,慕名请来李时珍。世子用了李时珍开的药后,竟神奇地药到病除。为了报答李时珍,楚王委任李时珍主管王府里的祭祖事宜,官居七品。3 年后,皇帝突然招揽天下名医,楚王应招,将李时珍推荐入太医院。

1552 年,李时珍断然决定不再以开业行医为主,而要集中主要精力,完成重修本草的伟大理想。李时珍用 18 年的时间进行野外考察,又用 10 年的时间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自己重修本草的心愿。

金圣叹:试卷连写 39 个“动心”

明末清初文坛奇才金圣叹,也曾三次名落孙山。第一次试题为:“吾岂匏瓜也哉,焉能击而不食。”他答题时在试卷上绘了一个光头和尚,一把剃刀。主考官问他这是什么缘故,他回答说:“此亦匏瓜之意形也。”主考官大怒,其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次参加科考的题目为“吾四十而不动心”。金圣叹在试卷上连写了 39 个“动心”。主考官追问原因,他的回答令人忍俊不禁:“孟子曰四十不动心,则三十九岁之前必动心矣。”又因此被除名。第三次,有“西子”题目,金圣叹提笔写道:“出其东门,西子不来;出其南门,西子不来;出其北门,西子不来;出其西门,西子来乎?西子来乎?”结果,金圣叹再次名落孙山。金圣叹失败在了与生俱来的幽默与玩世不恭上。



两岸关系经历的“数字时代”

两岸关系走到今天,经历了一系列的“数字时代”:以民间接洽破冰,缔造“汪辜会谈”的 1.0 时代;以党派接触继后,“胡连会”、“胡萧会”埋下官方接触的伏笔,被称为 2.0?时代;两岸官员零距离接触的“张王会面”,被台湾《经济日报》称为两岸接触的 2.5 时代。

隐秘的第三方外交

1949 年蒋介石率部众渡海赴台,围绕台湾地位和归属的“台湾问题”由此产生。多年后,解密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显示,毛泽东、蒋介石二人虽有“瑜亮之争”,却在两岸问题上有志一同,为和平统一曾通过中间人进行过秘密沟通。

1950 年和 1955 年,美国先后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和“台湾问题国际化”,都遭到蒋介石拒绝。1955 年 2 月 14 日,蒋对中外记者说:“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评论,蒋不想分裂中国,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双方虽都希望和平统一,却苦于无法沟通,只好求助于两边都说得上话、且立场中立的中间人。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蒋经国找到了 1949 年后居住香港的曹聚仁。曹的儿子曹

景行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回忆称,蒋经国曾两次约谈曹聚仁,商谈与大陆沟通事宜。

1956 年 7 月,曹聚仁到达北京,面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周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表示“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此后,曹聚仁多次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

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双方已建立初步信任。香港《大公报》报道,毛泽东保留庐山上的美庐别墅,打算让蒋介石在那里养老。并写了一首词《临江仙》,其中“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表达了希望蒋回大陆安度晚年的诚意。曹聚仁到台北,向蒋转交了毛的诗词,蒋看后十分感谢毛的好意。大陆所提“一纲四目”统一框架,也基本被蒋所接受。

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蒋介石慈溪老家被红卫兵破坏,蒋得信后顿生疑窦,遂中断与大陆的联系。

此后,双方多次努力恢复联系,均未果。1975 年,蒋介石通过秘密渠道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彼时,毛、周已是重病缠身,毛希望邓小平作为代表赴台,尽快实现“三通”。台湾方面闻讯十分欣喜,可惜还没来得及执行,蒋

介石就在 1975 年 4 月 5 日去世。

民间接触破冰

蒋经国执政后期，台湾政局风起云涌。1987 年 11 月，台湾宣布开放台湾人到大陆探亲，结束两岸 40 年人员不往来的局面。一时间，台湾媒体上满是两岸同胞白发相拥、涕泪横流的报道。这样的“人情牌”有力推动了两岸打破僵局。

1990 年 9 月，两岸的红十字会签署《金门协议》，开辟了官方授权民间机构进行商谈的途径。两个月后，台湾当局决定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1991 年 3 月正式挂牌。1991 年 12 月，大陆紧随其后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两会”的成立目的明确，很快成为两岸接触的先遣兵。

传为佳话的“汪辜会谈”开始前，“两会”在 1992 年进行接触和准备，达成“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认同，即“九二共识”。这个由民间团体达成的共识，在随后的 20 多年中被两岸多次当作解决纠纷的原则。

1993 年 4 月，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见面。两人握手的一刻被称为两岸关系的“历史坐标”，台媒称其为“官方授意、民间形式”的制度性商谈。

汪、辜二人 1998 年再次会面。由于当时的形势，“结果以次年 7 月的‘两国论’收场，两岸关系进入断裂恶斗时期”。

2008 年 6 月，新任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应海协会之邀北上，在北京与海协会新任会长陈云林会面，续上了中断近 10 年的“两会”会谈。

2012 年 9 月，江丙坤离职，香港《大公报》赞他“功成身退”，认为通过陈、江二人的努力，“近年两岸关系从破冰回暖，到艳阳高照”。4 年的 8 次“陈江会”，签署 18 项经贸协定，实现两岸三通，促进了两岸在旅游、邮政、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核电开

发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2013 年 6 月，新任海协会会长陈德铭和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在上海进行首次“陈林会谈”。

党派接触探路

2005 年 3 月，江丙坤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身份访问大陆，为连战之访铺路。这是 56 年来国民党首次正式组团访大陆，《大公报》将江丙坤此行称为两岸间第一次“党对党”正式接触，台媒更用“破冰之旅”来形容此行的意义。2005 年夏天，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的手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手握在一起，国共两党间断了 60 年的对话，终于重新开启。

2008 年，台湾地区“大选”使国民党重新上位。4 月，马英九的副手萧万长在博鳌论坛与胡锦涛会面。这次会面被视为 1949 年以来，两岸最高层的直接会谈。

近年来，两岸的党政要人进行了多次非正式会面，沟通日渐频繁融洽。民进党也出现了与大陆接触的呼声。2013 年 8 月，高雄市长陈菊为筹办 9 月的“亚太城市高峰会议”访问大陆，与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晤。

当局直接对话

2014 年 2 月，王郁琦成为首个访问大陆并与大陆官员正式会谈的台湾官员。台湾国民党原“中常委”邱毅认为，“张王会”是两岸接触从浅水区进入深水区的开端。

在两蒋时代，台湾外交人员遇上大陆同行时，按规定应“唱响反共歌曲”。后来稍微变通，台湾前“外长”、当过多年驻美代表的程建人告诉台湾东森新闻网，遇到大陆外交官，“互把对方当空气”，他驻外的最后几年，有时双方会稍微点头致意。

如今，两岸官方终于从隔空致意的“史前”时代，渐渐走到了执手相谈的 2.5 时代。



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的战略远见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但许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早决策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留在英国人手中比收回好

1949年10月，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兵临深圳界河边，却停止了脚步。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害怕英国在香港的一万多名驻军？当年12月19日《香港华侨报》头版头条的报道揭出了其中的秘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毛泽东生前虽未亲自踏上香港这片土地，但却长期关注香港问题，重视香港，并为香港回归作好了战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

解放军不打香港并非是到解放广州时才临时决定的，毛泽东对此问题早有考虑。

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过，对香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1949年年初，全国大局将定，毛泽东与斯

大林代表米高扬谈话时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其实，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形成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要从世界看中国的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中，毛泽东意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极力阻止中共上台执政，一旦中共执政，它们就会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而香港作为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比立即收回显然更加有利些。因为英美之间、美欧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矛盾，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就不能完全跟着美国走，来封锁中国。相反，为了维护香港的稳定和发展，必须同中国保持较好关系。

毛泽东看到，香港是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就存有矛盾。中国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就这样，香港成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塔、气象台和桥头堡，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

当时，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上述政策，曾受到国际上一些共产党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过于软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会允许殖民统治的存在。毛泽东回应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

正是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与新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也正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当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而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之时，香港更几乎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在此期间，香港不仅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它本身也因此而获得快速发展，很快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营造繁荣与稳定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一直恪守“协商解

决”的决策，正视英国在香港的长期统治，不干涉香港内部事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全国都处在极其混乱状态，香港本身也发生大规模反英“风暴”之时，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发生过任何动摇。

大家知道，为了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共高层一直要求有关领导不能拿内地的眼光去看香港，更不能用内地的办法去干涉香港。为了保证香港同胞的福利，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以优惠价格为香港提供生活必需品、淡水和工业原料，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时期（1959—1961年）也从未中断，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天旱，香港用水紧张，存水量告急，中央政府作出决定，“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应由我们国家举办，列入国家计划”。结果，东江之水跨山而来，解决了香港的水荒。

曾有学者称，“香港就是这么奇怪的城市，信仰社会主义的中央政府支援它繁荣”，“北京提供了战后几十年香港社会稳定的客观条件，也给予了投资者充分的信心。……实际上，香港战后几十年的‘繁荣与稳定’环境，是北京营造的”。而北京之所以能够在香港“营造”出这样的环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协商解决”的正确战略决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这一历程，我们对毛泽东的无量功德不仅应该牢记在心，而且更应以实际行动落实之，使香港能够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下，真正长期保持社会安定和谐、经济发达繁荣、民生欢乐幸福。这是毛泽东在60多年前所乐见的香港，也是香港人今天所企盼的香港。



西安城门趣闻(八)——玉祥门

(西安城西面偏北门,位于莲湖路西口)

1.玉祥门的命名

玉祥门是西安人民为了铭记冯玉祥将军1926年11月解西安围城之功而命名的。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生于1882年,行伍出身,曾先后任北洋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等职。

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政变,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6年9月,当国民革命军攻抵武汉时,在五原(今属内蒙)誓师,宣布所部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

在此期间,西安城正处在一场空前的劫难之中。1926年4月18日,北洋军阀吴佩孚部豫西的刘镇华率领“镇嵩军”7万余人包围

了西安。当时由李虎臣、杨虎城、卫定一所率的西安守城部队在兵力仅1万人、城内外交通断绝、粮食匮乏的情况下,城内军民殊死坚守。当时西安城内战死、饿死、病死者达五万人之多,形势十分危急。

在此紧要关头,冯玉祥从苏联回国,立即组建国民军联军,亲任总司令,率领援军解救西安,其于右任部的国民联军先遣部队在三桥、韩森寨等地击败镇嵩军。同年11月27日,刘镇华在围困西安达8个月之久后被迫撤围,向河南溃退,西安随之解围。

1928年,西安西城牆北段新辟一门(也有说此处为西安解围时国民联军入城的残缺口处),为了永久铭记冯玉祥将军解围西安之功,特命名此门为“玉祥门”。

2.玉祥门内昔为唐内侍省

今玉祥门内昔为唐内侍省处。内侍省为唐代宦官机构,是唐中央机构“六省”之一。内侍省长官为内侍监二人,秩从三品,内掌侍奉,外宣制令,总判省事,权任甚重。其机构庞大,下统掖庭、官闾、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六局。掖庭局掌官人名籍、司其蚕桑与女工之事,官闾局掌侍奉官闾及出入管钥之事,奚官局掌宫廷奴隶、工役及官人医药、疾病、丧葬之事,内仆局掌后妃车乘之事,内府局掌宫中财物与供物之事,太子内坊掌太子东宫财需之事。内侍省署在长安城西侧掖庭宫的西南部,其与皇城内的中央衙署的“南衙”,对称为“北司”。唐代时期“南衙北司”之争,即朝官和宦官之间的冲突斗争,从唐肃宗、代宗时就展开,终唐之世,从未停止过。1978年5月在今玉祥门内西五台以西,距今西安西城墙240米处的唐内侍省遗址,发现了“光化二年(899年)岁次乙未六月癸亥朔丑建的《大唐重修内侍省之碑》”。

3.玉祥门内云居寺

在玉祥门内南侧有一座著名的尼寺,名云居寺。寺址建在原隋唐长安宫城南墙的一段残基上,高25米,土台基,占地面积约1.56万平方米。据传宋代因台建寺,初称安庆寺,明洪武时重修,改称云居寺。实则此段城基唐末以后应为韩建新城的北城墙,明初向北拓筑城墙后始留其残基而能建寺。

云居寺因其佛殿依其台基地势起伏分别建在五个高台上,而其位置又在城内之西隅,故该寺又俗称“西五台”。[雍正]《陕西通志·

祠祀》引总督鄂海碑云,此寺“有祷必应,六月大会,岁以为常”。“由三天门拾级而上,层台绀阁,环列左右。最高处为大士殿,登殿四望,目收一郡之胜。”云居寺“文革”中曾遭破坏,现前台,中台、后台诸寺殿已重建恢复。前台大殿塑佛祖释迦牟尼像,中台殿塑观音大士像,后台殿塑卧佛,有赵朴初题“卧佛宝殿”额。

4.玉祥门外张骞通西域铜雕像

玉祥门外正西圆盘中心竖有汉张骞通西域铜雕像。张骞,西汉探险家,汉中城固(今陕西城固)人。武帝初为郎,曾两次出使西域。建元二年(前139年)与堂邑父出陇西,越葱岭,亲历大宛(古西域国名,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西域古国,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和大月氏(古族名,在中亚阿姆河上游)、大夏(中亚古国,在今阿富汗北部)等地,元朔三年(前126年)归汉。元狩四年(前119年)以中郎将奉命出使乌孙(古族名,在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并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夏、安息(西亚古国、伊朗高原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他两次出使,开辟了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原和西域少数民族的联系,进一步发展了汉朝与中亚各地人民的友好关系,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史记·大宛列传》:“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张骞出使西域的汉长安丝路起点在汉城西面南头的章城门,旧址在今西安市西北郊三桥镇东北的东雁雀门村北。



西安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

——大雁塔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原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文化遗产申请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名单中确定中国有22处遗产点、哈萨克斯坦有8处遗产点、吉尔吉斯斯坦有3处遗产点。

中国公布的22处丝绸之路遗产点包括:河南省4处、陕西省7处、甘肃省5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处。西安市的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在列。

大雁塔又名大慈恩寺塔,位于西安市南郊大慈恩寺内。因坐落在慈恩寺西院内,大雁塔原称慈恩寺西院浮屠(浮屠即塔的意思)。是保存比较完好的楼阁式塔,是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和著名古迹。是中国唐朝佛教建筑艺术杰作。也是目前可以供登临的少数古塔之一。

大雁塔是砖仿木结构的四方形楼阁式塔,由塔基、塔身、塔刹组成。全塔通高64.7米,塔基高4.2米,南北长约48.7米,东西长约45.7米。塔身为七层,塔体呈方形锥体,由仿木结构

形成开间,由下而上按比例递减。塔内有木梯可盘登而上。每层的四面各有一个拱券门洞,可以凭栏远眺。整个建筑气魄宏大,造型简洁稳重,比例协调适度,格调庄严古朴。

据史料记载,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后,带回大量佛舍利、上百部贝叶梵文真经及八尊金银佛像。为了供奉和珍藏带回的佛经、金银佛像、舍利等宝物,经朝廷批准,玄奘亲自主持建造了大雁塔。距今已有1300余年。

因砖表土心,风雨剥蚀,五十余年后塔身逐渐塌损。武则天长安年间(公元701—704),女皇武则天和王公贵族,施钱在原址上重新建造,新建为七层青砖塔(另一说,公元704年大雁塔改建成,塔增高至10层。公元931年,五代时后唐时期对大雁塔进行改建,降至七层)。唐末以后,慈恩寺寺院屡遭兵火,殿宇焚毁,只有大雁塔独存。

五代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对大雁塔再次修葺。后来西安地区发生了几次大地震,大雁塔的塔顶震落,塔身震裂。(原先塔高11层)。

明朝万历二十三年(1604)在维持了唐代

塔体的基本造型上，在其外表完整的砌上了60厘米厚的包层，使其造型比以前更宽大，即是现今所见的大雁塔造型。

大雁塔为何称作大雁塔，如今仍有多种传说，最常被人提起的有三个。一是古印度迦蓝佛曾“穿石山做塔五层，最下面一层作雁形，谓之雁塔”。玄奘最初设计建造的塔就采用了这种形制；二是佛教有大乘与小乘两派，小乘佛教不忌荤腥。有一天小乘寺院和尚买不到肉，天空一群大雁飞过，和尚仰面语：“今日僧房无肉吃，大慈大悲的菩萨一定不会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话音未落，一只大雁折翅坠地。于是，全寺和尚大惊失色，领悟出这大雁分明是菩萨化身，他们在大雁坠地处建造石塔从此戒绝荤腥，改信大乘佛教，因此佛塔又称雁塔；三是当年玄奘取经途中曾困于

沙漠，后来得到大雁引领，才找到水源，得以生还，建造这座佛塔是为报答菩萨化身指点迷津的大雁之恩。

其实玄奘建成大雁塔后，从没提过塔叫什么名字，只说是慈恩寺西院的塔，或称其为慈恩寺西院浮屠。但玄奘所建的塔是模仿曾见过的“亘娑塔”，“亘娑”译成中文就是“大雁”，人们就把建成的塔叫大雁塔。武则天时重修佛塔后，便正式命名其为“大雁塔”，该塔名一直沿用至今。

大雁塔在唐代就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因而留有大量文人雅士的题记，仅明、清朝时期的题名碑就有二百余通。1961年国务院颁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经过一次整修，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风貌。如今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世界文化遗产。

·解字·

“助”



①



②



③

这是“风助火势”的“助”字，本为形声字。①是金文的形体，其上部为“且”（表声），其下部为“又”，“又”就是“手”（表形），可见该字是“从又，且声”的形声字，表示“以手助”之意。②是小篆的形体，将金文的“又”移到“且”的右边，并且换作“力”，以“力”助也很有道理。③为楷书的形体。

《说文》：“助，左也。”这里的“左”就是“佐”字的本字，为“帮助”之意。可见“助”的本义为“帮助”，如《孟子·公孙丑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大意是：坚持正义就能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违背正义必然陷于孤立无援。

“助纣为虐”，本指帮助商代纣王干暴虐之事，后世多用来比喻帮助恶人做坏事。后来有人将这个成语写作“助桀为暴”，这并不错，在《史记·田单列传赞》中就写为“助桀为暴”。“桀”为夏代的暴君。

请注意：“助”字可作“锄”字的通假字，表示“除去”的意思，如《庄子·徐无鬼》：“以助其色。”这是说：除去他的骄人之色。这里的“助”应读作 **chu**。



白家口村

位于西安市西北方向，距明城墙的西北角大约 2.5 公里，距西安钟楼大约 5 公里。地处沣惠路与大兴路交汇处东 400 米处路南，有西村、北村和东村三个自然村，为第二、三和四村民小组。在东北方向距此一公里路北是高窑村，为第一村民小组。村西西二环，村北大兴路，有 21 路、9 路、261 路、二环线车等十几条公交线路，交通极为便利。白家口村地域和周边有“汉长安城遗址”和“汉长安未央宫遗址”，其中“汉长安城遗址讲武殿”就在该村的土地上。

据《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第 137 页记载：清乾隆年间有村，清·嘉庆《长安县志》为白家口，清末为白家口二村。高窑村目前是白家口一组，清·嘉庆《长安县志》称为“高家窑”、《两县读志》称为“高窑”。白家口村的全意，应该是“居住在唐长安城郭城北墙出口处的白家村庄”。村民来自全国各地，村中姓氏众多，主要有：黄、王、汪、张、乔、杜、李、高、周、谢、刘、蒋等二十多个姓氏。1949 年全村仅有 120 多户，615 人。1956 年全村有 136 户，834 人。1963 年全村有 152 户，899 人。1973 年全村有 163 户，1103 人。1983 年全村有 380 户，1040 人。1992 年全村有 478 户，1090 人。2009 年全村有 503 户，1310 人，流动人口约 1

万人。

民国 34 年(1945 年 11 月)，西安首次设 12 个区，但行政组织白家口村和高窑村属于未央第。1949 年 5 月 20 日西安解放后，村中设农会、农会主任。1950 年成立互助组，设村组长，1954 年 1 月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设主任。1956 年成立高级合作社，在此期间全部农户入社。1957 年 6 月白家口划归莲湖区，成立红庙坡街道办事处。1958 年 8 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归属未央宫人民公社管辖。同年 9 月由村合作社改为生产大队，下辖四个生产小队，即高窑、西村、北村与东村小队。1960 年 5 月红庙坡街道办事处划归未央区大明宫公社，白家口村在红庙坡分社。1978 年恢复红庙坡街道办事处，白家口归其管辖。1982 年 1 月 24 日由未央宫人民公社划归莲湖区由区农村工作局管辖。2010 年初区农村工作局将白家口村移交红庙坡街道办事处管辖至今。2010 年改为白家口社区居民委员会。

20 世纪 50 年代，政府在该村征地陆续建设了许多企业，在村原有地域和周边建设有西安肉联厂、西安石膏厂、白家口粮库、国家稀有金属仓库(533 库)、省建一公司、西安市黑色金属材料总公司、市汽车二大队等单位

和企业。

从新中国成立初至 1979 年,村民基本上从事农作物和蔬菜种植。1979 年后至旧村拆迁前,村民基本上搞个体经营和房屋租赁。

1963 年设立乡村医疗站后改为村卫生所,配一名医生、二名护士。20 世纪 70 年代末,该村自投资金 24.5 万元,自办一座室内影剧院,设座位 1260 个,观众席分上下层。当时为节约成本,座椅铸铁腿全是在村农具厂铸造车间自己铸造的。村上设专人管理和负责放映工作,村自办电影院带动了村上其他产业,其中村办冰棍厂就是其中之一。

1953 年,村子自己盖了一所小学。1973 年更名为“莲湖区大兴路小学”,学校占地 2300 平方米,有一千多平方米教学楼,800 平方米操场,内设各种专用教室,设施设置达市二类小学标准。有教师 29 人,其中高级教师 10 人,学生 610 人。学校设有微机房、实验室、音乐室、图书室等。2008 年小学校址拆迁。

村民原住房面积合计为 146920 平方米,2009 年 6 月实施旧村改造,已回迁,新建村民安置楼六栋,回迁村民安置面积 133330 平方米,房屋 1378 套,回迁村民 433 户。

北火巷村

位于龙首北路,北起纬二十六街,南至市政东西规划路,东临永兴路,西到市政南北规划路。村域土地面积 92.24 亩,212 户,556 人。

村原处于西门外,环城西路北段路东的一条巷子里。1958 年由五一村划出,取地名北火巷而得名北火巷村。

新中国成立后,北火巷村先后隶属西安市十二区、阿房区、郊区、雁塔区、莲湖区管辖,并历经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在计划经济时期,主要以蔬菜种植为主,村民吃粮由政府统一调拨,生产经营单一,集体经济薄弱,村民生活欠富裕。

改革开放后,村人解放思想,凭借地域优势,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首先创办红星机械加工厂、红星饭店。20 世纪 80 年代初,又相继开办高压隔离开关厂、红星加油站、卷闸厂、硅铁厂等企业。20 世纪 90 年代初,又创建西北五省最大的西门食糖批发市场,年收入达到

1700 万元。村办企业的兴起,增强了集体经济的实力,当时村固定资产达 7000 多万元,年上交国家利税 200 多万元,村民人均收入 10000 多元,步入小康村之列。昔日的农民变成企业的工人,同样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节假日制度,分配形式由工分制变为工资制,并享受退休退养的待遇,农民的概念成为过去。北火巷村的巨大变化,曾引起全国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得到省、市、区的肯定和表彰,先后荣获全国、省、市、区授予的“小康村”、“小康村先进党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五个好先进村党组织”、“文明村”等荣誉称号。

2003 年 7 月,在西安市建设环城西苑过程中完成整村拆除。市政府在龙首北路置换土地 92.24 亩,用于全部村民的安置和集体经济发展用地。

2008 年,撤村建居,成立北火巷社区居民委员会,归红庙坡街道办事处管辖。

红庙坡村

位于西安古城墙西北角，在西安市区一环以北，纬二十六街以南，东距迎宾大道 1 公里，西离星火路 0.5 公里，居市区一环与二环中间，相距不到 2 公里，出尚武门(小北门)向北经自强西路即达。由三个自然村组成，由西向东为：西村、中村和东村。该村北有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边有机电批发市场、西北建材市场、朱宏路机电市场等，村边有商业街大观园商贸城，数条城市干道从村中穿过。村内周边公交线路繁多，528 路、702 路穿村而过，2 路、9 路、208 路、262 路、18 路、21 路、26 路、202 路、708 路等 20 条公交线路均在村周，交通极为便利。2010 年土地面积 517 亩，1235 户，3544 人，下辖 11 个村民小组。有 30 多个姓氏，车、白、觉、谭、马、杜、陈、黄、冯、李、孙为大姓，近 20 个。

村子早在唐代之前就有村民生息繁衍，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耆民徐楫重修应天府尹王鹤撰记“先有昊天观，才有长安县”脍炙人口的话语流传至今。据传昊天观建在红庙坡村东，气势恢宏，有玉皇、三清、老君、观音菩萨等 9 座大殿，其中观音菩萨庙距地 10 米之高，远远望去，红色庙墙格外壮观，所以被人们称为“红庙”。又因村东有一条长长的坡，村子位于坡下，后因人口繁衍，移居坡上。



“红庙坡”村的村名由此而来。

清雍正八年(1730)红庙坡村属长安县红庙廨所辖(《长安县志》)。民国 20 年(1931)长安县废廨设区、乡、村，红庙坡村属红庙坡乡辖。民国 29 年(1940)实行县制，设区、乡、保、甲四级。1954 年属西安市第十一区红庙坡乡所辖。1954 年至 1958 年属西安市未央宫乡管辖。后改人民公社，属未央宫人民公社辖。1960 年至 1965 年属西安市莲湖区农业办公室辖。1966 年归未央宫人民公社，1983 年以后归西安市莲湖区辖。

红庙坡村先后有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生产大队、文革中的革命委员会等组织，1982 年以后由村民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

1950 年村建立党支部委员会，共青团、妇联、民兵组织健全，村民参政议政热情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村中经济以农为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以土地为资源创办村级企业，村上先后建起生物化工厂、村办游泳池、汽车修理厂、服装厂等，村民自主经营企业也蓬勃发展，红原机械厂、全亿机械厂、红星篷布厂、电梯配件厂等私人企业挂牌生产。2001 年 2 月红庙坡村被西安市农村改革试验领导小组确定为“都市化村庄建

设改革试验点”，制定出了都市化村庄综合工程项目计划。2005年开发出了城中村改造工程住宅永新苑小区。2006年10月完成了村上农业户口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户口的任务。2007年竣工1至4号楼，2009年11月竣工两幢高层（16层和18层），带动十个村民小组相继为村民盖起了多栋安置楼。村上完成村民住宅建设项目50多万平方米，安置村民99%以上。2008年完成了村上股份制改造工作。

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村民文艺也有了长足发展。村上的同乐会在民国时期就有一定规模开展活动，开展活

动经常且有名声和规模。村中的锣鼓队逢正月盛装出演，人数达600-700人，绵延约一华里，1994年获西安市锣鼓王大赛金奖。村民党国蕾最高荣誉获全国象棋个人赛冠军和亚洲锦标赛女子个人赛冠军。

红庙坡小学成立于1947年，1953年交为社会统一教学管理。村办合作医疗站成立于1969年，1985年后实行挂号不收费、医药费收一半，村民一般小病不出村。1985年改建为村卫生所。2008年红庙坡村95%村民参加并办理了社区医疗保险，现有80-90岁老寿星22人。

纸坊村

地处隋大兴城遗址和唐太极宫遗址之上，周边有唐宣武门遗址、西安明代城墙尚武门、广仁寺、龙首原等遗址，“头枕唐代宣武门，脚踏西安明城墙”。居莲湖区中东部，东与原北关村、郝家巷接壤，西与原张家村相连，南与明城墙北城河、陇海线毗邻，北与红庙坡村连接，工农路穿村南北，南有环北路、北有自强西路、西接星火路、北倚北关正街，周边近20条公交线路，交通十分便利。村庄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由纸坊村、王家村、赵家村三个自然村构成，771户，1776人。

据口头传说，明代建村，已有600年左右历史。有文字可查是在清嘉庆十七年（1813），《长安县志》记：北乡廨一，红庙廨辖纸房（纸坊村）、王家村、赵家村。原名叫八家巷，清代有一朱姓迁址村中段居住，在打围墙时发现铭砖有文字记载，经当时官府鉴定，这里可能是唐代的造纸作坊，故名。村中赵、孙、王、文、杨、戴、朱、伍常、马为大姓。

村子随政府区划调整先后经红庙坡、北关大明宫、大白杨等乡辖治，1982年1月归莲湖区农村工作局管理生产事务，2008年交至莲湖区红庙坡街道管辖至今。2009年4月改制为居民委员会并完成村股份制改制工作。1989年纸坊村（友谊大队）通过选举建立第一届村民委员会。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村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改革开放后，搞规划、办工厂、抓营运、兴三产，集体、个体、民办、联办一起上，独资、引资、合资一起搞，先后开办莲湖区新兴纸箱厂、宣华木器厂、西安自强西路调料加工厂、西安友谊机械厂、办粮站、建兔场、豆腐坊、挂面厂，电焊、气焊修车铺等近10个企业，从业人口达200多人。1987年村上宝华餐厅开门营业，1997年宝利华餐厅开业，1980年纸坊村友谊饭店迎客。在一系列发展举措下，1996年实现产值千万余元。2005年3月村股份有限公司自筹资金在陇海铁路线北建

●我们的村落●

起两栋 28 层高楼的“芙蓉新天地”小区,2008 年底竣工。总面积 83000 平方米,736 套住房,安排村民 190 多户入住,余下 70 套房售出。作为配套建设,2007 年第三村民小组投资建设 3 栋多层 760 套 30000 平方米住宅楼,安排村民 160 多户入住。2008 年第五村民小组合资合建“尚美逸居”小区,总面积 23000 平方米,安排村民 156 户入住。这些小区由村自营物业管理,既有收入,又安排了村民就业。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该村大力发展村民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工作。1999 年 5 月组建村武术队,先后获西安市农民运动会太极拳、剑术集体、个人一等奖。村合唱队、秧歌队、锣鼓队都获有荣誉。在村社区和小区设立多处体育锻炼设施,让村民强身健体。

由纸坊村兴建的工农路小学(原纸坊村小学)占地 186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550 平方米,12 个教学班,564 名学生,28 名教职员工。纸坊村村办幼儿园 2 座。1972 年纸坊村成立合作医疗站,有医护人员 5 人,有一般的医疗设备,可做小型手术,2001 年合并至红庙坡医院。至 2009 年底,该村办理居民医保人数 1564 人,占总人数的 80%。

孙桂兰,1982 年 4 月获“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1983 年获“西安市劳动模范称号”;戴海峰 1982 年获“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村民王秋钱是中国武术五段、国家二级裁判员。纸坊村现有 80 岁以上寿星 21 人,70 至 79 岁老人 29 人。现有博士研究生 1 人,硕士研究生 10 人。

丰 禾 村

位于西安明城墙西北角方向的丰禾路上。东临星火路,西至西瑞面粉厂,南与陇海线为界,北接大兴路,由五个自然村组成,即东郭家口村,火烧壁西村、火烧壁中村、火烧壁东村、张家村。村域土地 462.6 亩,其中宅基地 245 亩、道路 54 亩、出租 73.6 亩、小产权用地 90 亩。全村 1268 户,3375 人。丰禾村的前身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丰禾社。因它以丰禾路为轴线贯穿丰禾路沿线两侧而得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隶属西安市十二区、郊区、未央区、莲湖区管辖。并历经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计划经济时期,丰禾村近 2000 亩土地先后被国家建设征用。20 世纪 60 年代,该村被政府划为蔬菜生产基地。为了城市菜篮子建设,村上办起了蔬菜生产试验站、养猪场。为了发展集体经

济,又先后创办了丰禾农具厂、丰禾汽车运输大队、火西村豆制品厂、酱油醋厂等村办企业。改革开放后,依托近邻西站货场及商储公司等大型企业的优势,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交通运输业、吊装业和建筑机械租赁业,使集体经济和村民个人收入快速增长。

为了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投资建起了文化活动室,保存各类图书资料 1000 多册,供村民学习之用。另外,还组建了锣鼓队、秧歌队,多次代表区上参加市级农运会,并获得象棋、跳绳等项目比赛奖牌。历年被评为区级“文明村”、“先进基层党组织”。1998 年荣获市级“小康村”称呼。

2009 年 4 月,撤村建居,成立丰禾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划归红庙坡街道办事处管辖。



中华老字号

春发生葫芦头泡馍系列制作技艺

(◎ 乌云高娃 整理)

葫芦头泡馍，是极具特色的陕西著名风味小吃，尤其以春发生的最为正宗。其历史源远流长。在唐代，京城长安流传着“煮白肠”、“猪杂羔”等小吃(即今日之葫芦头)，因其味美汤鲜受到社会各界的喜爱。相传药王孙思邈游医四方，途经长安东市，在品尝“猪杂羔”时觉其味腥油腻，遂从药葫芦里取西大香、上元桂、权阴椒等健胃祛腥之物，授店家以使用方法，并将药葫芦一并赠予。其后“猪杂羔”一改旧貌，味香四溢，久吃不腻。店家感念药王点拨之恩，遂将药葫芦视为“吉祥”之物高悬门首，并将“猪杂羔”更名为“葫芦头”，承传至今。

春发生饭店的葫芦头泡馍制作工艺十分考究，始终坚持传统的制饼、洗肠、熬汤、泖(mào)馍工艺，以及精工细作的工艺和各种调

和料的使用密不可分，使春发生“葫芦头泡馍”几十年保持原汁原味。1997年被中国烹饪协会评为“中华名小吃”，国家贸易局授予中国“名菜名点”。

葫芦头泡馍的饼，是独具特色的，它是由70%的死面和30%的发面组成，又称“七死三活”，经过和面、轧面、揪面剂、揉面剂、擀剂、入炉烘烤等多道程序制成，这样饼在泖制的过程中才能保证馍块的筋度，味道也与众不同。

葫芦头泡馍的原料以猪大肠为主，这是其独有的特征，而且在大肠的选择上，更是格外的严格，所选的熟肠整根长30—45厘米，最粗处直径为3—5厘米，呈熟肠黄白本色，无杂色斑点，有熟肠特有的香味，肠壁内无花油杂质，无冰碴。成熟度好，以用手能掐透肠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壁为度。

葫芦头泡馍的烹饪技法为“泐”，这是葫芦头泡馍独有的操作技法。葫芦头泡馍的成形，关键在厨师最后的加工手法“泐”上，这是烹调技艺中一种古老的传统工艺，“泐”是关中俗语，意为汤浸物也。“泐馍”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一碗葫芦头味道如何全在这个“泐”，好的厨师能熟练运用旋、转、打的手法，使馍全部浸透，馍块滑软没有硬心、调制、渗透均匀、层次分明、造型美观、越吃越香，尤其在“泐”制口汤、干泡时不同于煮馍利用火候收汤，而要全凭馍“泐”的程度及汤渗入的多少来掌握，只有馍“泐”到了、“泐”匀了，顾客食后才会味香缠齿、回味无穷。

葫芦头泡馍的口味取决于汤、大肠和馍，所以葫芦头在制作时有严格的操作标准，从吊汤、洗肠、煮肠、制饼都要严格执行标准，这样才能保证其口味肉嫩汤鲜，油而不腻，醇香扑鼻。馍块质地绵软滑韧，有粘连质感。大肠体现出独有的香味。食用时配以秘制油泼辣子、特色泡菜和大蒜，味道更加的鲜香、醇正。

1920年，一位叫何乐义的关中汉子挑着担子在西安南院门沿街叫卖葫芦头，深受市民喜爱，于是在西安当时繁华的五味什字开了一家“何记葫芦头”(春发生前身)，由于他选料精细，配制得当，调味考究，别具一格，生意异常火爆，不久便成为西安的一道名吃。后何乐义将其秘方以及制作技艺传于徒弟张廷玉。张廷玉很快完全继承何乐义的技艺，而且手艺更胜师傅一筹，何记葫芦头的口味更加纯正、制作更加精细。一时间，“何记葫芦头”蜚声古城内外，成为社会名流、达官贵人经常光顾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末，一位陕西文人，在品尝汤浓味鲜、香气四溢的何记葫芦头

后，有感而发，遂取唐代诗人杜甫的《春夜喜雨》中“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诗句，为该店起了一个极具诗意的店名，即“春发生”。

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春发生饭店”，迁往南院门中段，营业面积100多平方米。并在原来单一品种基础上，研发出10余种泡馍品种。六、七十年代，“春发生葫芦头泡馍”更成为西安广大市民可望而不可及的美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春发生葫芦头”实行凭票供应，多数人路过南院门时只能是向春发生店内偷觑一眼，咽咽口水而已，即便是有幸得到一张餐票，也是买了端回家把一碗掺成几碗吃。

改革开放以来，春发生饭店葫芦头泡馍已由单一的品种，研发出十余个品种。有海味葫芦头、精肠葫芦头、精肥葫芦头、特制葫芦头、鸡片葫芦头、大肉葫芦头等。并在“葫芦头泡馍”的基础上，挖掘研创了“五行菜”，即以猪肠、腰、心、肝、肚为原料烹制的各种菜肴。按肠属金、肝属木、心属火、肚属土，以及以脏养脏的传统食疗方法进行研制。经过多年的试制，采取炒、炸、烧、炆、挂汁等烹调技艺研创出近百个品种。

2009年6月，列入陕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代监狱

谈古论今说贪官

古代贪官出事之后、人头落地之前，他们孤独冷坐监牢之中，举头仰望窗外星空，悔罪之情涌上心头。很多有文采的贪官也会以诗言志，把自己狱中的复杂情感通过诗作的形式表达出来，贪官们死到临头的这种诗作权且称之为“贪官绝命诗”。这些绝命诗暗含一个共同的特点：诗多有“梦”。那么，他们临死前到底在做什么梦？他们用梦抒发什么复杂情感？他们为何多梦？不妨从古代几个最有文采的贪官诗作中探索一二，为他们绝命前的心绪解解梦。

贪官一旦出事儿，收入监牢之中，无疑会失去自由之身。监牢之中，四壁皆空，遥想昔日膝下天伦。很多贪官会把对亲人的思念化为梦幻，对昔日的温馨生活进行回味，聊以慰藉内心的恐惧和寂寞。清朝奉天东三省测量总局有一个小科员叫焦滇，为了弄两个糟钱花，不惜将东三省详细地图和总督治省方略偷送给日本人，东窗事发后被捕入狱，就地正法。在狱中，焦滇回想起一家老小欢聚一堂的

情景，不仅泪沾衣襟，留下“宴罢归来笑语嬉，娇妻稚子一床围。鹃啼惊破鸳鸯梦，谁识今朝诀别时”的绝笔。

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些贪官入狱以后，想想以前的荣华富贵和牢狱中的监吏叱责，巨大的反差刺激着他们的神经，他们不相信眼前的这些会是真的，虚无缥缈之中感到，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唐代有个宿州太守叫陈王番，因贪赃被处以极刑，临刑之时他悔恨不已，写诗道：“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这个梦，是由祸惹引起的，祸是由积玉堆金所起，堆金则是由于自己的贪得无厌所致，作为阶下囚，钱财已分毫不值，名声已彻底扫地，一生的追求到头来究竟得到了什么？看看身上的枷锁，所追求的荣华富贵其实就是一场令人可笑的白日梦。

蔡京是北宋最腐败的宰相之一。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将蔡京贬到岭南，路上他写了一首《西江月》：“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

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正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流放途中，他的金银珠宝装了满满一大船，幻想在瑶池阙下能够过上逍遥生活，然而这个老东西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关门闭户，不但不卖给他东西吃，还用剩菜臭屎砸他，最后“腹与背贴”，活活饿死。大凡贪官无论何朝何代，均没有什么好下场，不是杀头坐牢就是流放穷山恶水，到头还是小命难保。很多贪官绝命前，会将生前的辉煌与眼前的凄凉好有一比，对自己的人生历程再回首，他们流连往昔的荣华和生命的可贵，贪恋昔日人上人的生活，但这一切在现实中已无法实现，只有靠做梦来解渴了。

大贪官和珅，绝命前更是显示了非凡的文采，他写下的《狱中对月》倒是直接了诉说了自己的牢中处境和心得体会：“夜色明如许，嗟予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晓，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縲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馀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和珅自缢后，又从他的衣带里发现一首七绝：“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记取香烟是后身。”这个老东西，绝命诗中诗诗有梦，他的梦，倒是描写了当初他对人生的追求和人生抱负的实现。而当他准备撒手人寰时，他感到当初为了梦而追求，到头来还是如梦一场，自己的有才造就了高高在上的辉煌，而如今的下场也正是因为自己太有才，这也应了“有才无德便是祸”的民间俗言。

综观贪官绝命之梦，有眷恋家庭者，有回首辉煌者，有感叹不幸者，有悔恨不已者。不管怎么说，临死前爱做梦，似乎是很多贪官共

同的生理反应。那么，这些贪官的梦从何来？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梦？这要从梦的生物情感效应说起。俗话说，朝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属于灵魂医学范畴，是由内外信使的刺激，引起大脑的一小部分神经细胞活动，表现为高层次灵魂的最低水平的意识状态。东汉王符所说的“性情之梦”，《列子》所说的“喜梦”、“惧梦”、“噩梦”均属于情感引起的梦。明代的熊伯龙在承认思虑致梦举例说：唐玄宗好祈坛，梦玄元皇帝；宋子业耽淫戏，梦女子相骂；谢眺梦中得句，李白梦笔生花，皆忧乐存心之所致也。

当然，牢狱中的贪官们虽然可恶如兽，但他们毕竟还是人，也有自己的情感，死到临头他们也会幻想一番，把自由的压抑化为梦境，用以抒发对生命的挽留和美好生活的怀念。牢狱内外的巨大反差，事发前后的天壤之别，所有这些都是对贪官们最直接的刺激因素，在狱中，他们的情感是最复杂的，思维是最活跃的，心情也是最痛苦的，这种刺激是对人的最大刺激，爱做梦是必然的。想想自己做的亏心事，他们或许会被噩梦惊醒，想想往日的辉煌，他们也许会在梦境中得以解脱，想到生命立马就要结束，他们肯定噩梦连篇。

鲁迅说过：“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这句话对死到临头的贪官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因为不惊醒他们的梦，如何取他们的头颅？看来，贪官们到死也是不得安宁的，人在政坛，要想一辈子做好梦，唯一要记着的一句话就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李鸿章与 11 国的
驻华公使在一起。(图中
前排右二是李鸿章)

李鸿章的 外交笑话

李鸿章作为晚清外交第一人，为垂暮之年的大清外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因为不研究西方的社会制度，不研究西方人的生活习惯，不懂西方的社交礼仪，因此在外交上闹出了不少笑话。

一、英国名犬成为李鸿章的美餐

李鸿章当年出访伦敦时，经幕僚建议，他前往海军上将戈登的纪念碑致敬。戈登家属听说了，为表谢意，特将一条名犬赠送给李鸿章。这可不是条平庸之犬，它曾在数次大赛中获奖，若不是因为李鸿章作为中国总理一级的高官来访，戈登家人才舍不得忍痛割爱。不料数日后，戈登家人收到李鸿章的一纸谢柬，内称：“厚意投下，感激之至。惟老夫耄矣，于饮食不能多进，所赏珍味，感欣得沾奇珍，朵颐有幸。”原来李鸿章竟以为人家是送狗肉给他吃，回到寓所，李鸿章就让厨房师傅将犬宰了，美美地吃了一顿，一条珍贵的名犬就这么有幸地进了李相国的肚子。事后知道这件事，戈登家属们在背地里气得暴跳如雷，极度痛恨这位愚昧无知的大国总理。但是，出于外交

礼仪，戈登家属也不好发作，只是李鸿章的行为给外国政要增添了茶余饭后的笑料。

二、在沙皇珍贵的地毯上随地吐痰

到俄国访问时，李鸿章又出了洋相。由于他的身份和地位，当他来到俄罗斯时，沙皇听说这位中堂大人在中国国内素以善知国际礼仪著称，特地命人在会客厅铺上一张名贵的波斯地毯来接待他。到了俄皇宫中会见之时，李鸿章与俄方谈得十分投机，谈兴浓烈，兴之所至，信口侃去。突然他大声咳嗽起来，然后一口浓痰，向地毯上吐去！俄沙皇顿时目瞪口呆。可是李鸿章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只是仍然继续高谈阔论，无所顾忌。俄皇只好继续洗耳恭听，心里却是苦不堪言。等会见结束以后，中堂大人刚一离去，俄国沙皇便气急败坏地命人将这条珍贵的波斯地毯揭下，从此再也不能用了。当然，李鸿章的这种不检行为很快就在俄国上流社会传开了。

三、四百年名酒一口牛饮喝光

李鸿章不喜欢喝葡萄酒，有一次来到德国前首相俾斯麦将军家里，将军为了表示对

●文史拾趣●

李鸿章的尊敬，特意拿了一瓶珍藏了400年的名贵葡萄酒招待李鸿章。将军斟了一小杯后，就将瓶子剩下的酒给了李鸿章，意思是让李鸿章自己斟酒喝，李鸿章不明白将军的意思，也不懂得西方人喝酒的习惯，反而觉得将军太小气，李鸿章就顺手拿了一个大杯子，满满斟了一杯，咕咚一下就喝了下去。将军有些吃惊，但是没有等将军回过神，李鸿章觉得酒味道很好，又自己斟了一杯咕咚一下喝了下去。很快，将军珍藏了400年的名酒就让李鸿章像喝白开水一样喝完了。按照西方礼仪，珍贵名酒一般是主客慢慢斟酌喝的，这样才有较高的情调，可是李鸿章不懂得西方酒文化，只把名酒当作普通酒，豪喝牛饮。

四、在美国炫耀黄马褂险些惹祸

李鸿章在美国访问期间，一直把黄马褂当作无比荣耀的资本用来炫耀。据清制的规定，只有对朝廷有重大功勋的大臣才可以赐黄马褂，有清一代赏赐黄马褂的没有几人，而李鸿章凭着他剿太平除捻军的功勋，得到了朝廷赏赐的黄马褂，李鸿章非常珍惜，只有重大节日或者皇上召见他才舍得穿上。这次出使欧美，李鸿章觉得非常荣幸，同时也觉得是炫耀自己的最好时机，因此，李鸿章到了美国后，就一直把黄马褂穿在身上。美国人错误认为李鸿章穿的是龙袍，而龙袍只有皇帝才能穿，所以当时美国媒体认为到访的是东方大国的中国最高领袖，一家当地颇有影响的报纸《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总统李鸿章到访”，甚至有的报纸刊登了李鸿章跟慈禧太后结了婚的新闻，一时间国内议论哗然。后来，随从幕僚将情况告诉了李鸿章，李鸿章吓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穿着黄马褂招摇过市了。好

在慈禧太后对李鸿章并无猜忌，李鸿章出访回来后慈禧并没有为难他，否则李鸿章就吃不了兜着走。当然，不知是因为李鸿章出访闹得慈禧不高兴，还是甲午战争失败受到挤压的原因，李鸿章出访回来后的几年时间里，一直坐冷板凳。

五、痰盂挂在腰间当装饰

李鸿章因为烟瘾大，每天基本烟不离手，久而久之肺部就出了问题，痰特别多。为了方便吐痰和放烟灰，李鸿章特别让家里人给自己做了一个可以随时使用的方便痰盂。据说这个活动的痰盂做得特别精致，方便李鸿章别在腰间，既可以当痰盂使用，也可以当装饰使用。李鸿章非常满意，除非特别重大的仪式，一般李鸿章都会将痰盂别在腰间，以便随时使用。在英国访问时，英国女王设宴招待李鸿章，那天李鸿章也将痰盂别在了腰间。晚宴中，一位英国公爵的夫人看到了李鸿章精致的痰盂，以为是一件非常珍贵的装饰品，就禁不住大加称赞。而李鸿章听不懂英语，看见公爵夫人指着自已腰间的别挂，以为夫人想看看，李鸿章没有多想，就随手将挂在腰间的痰盂摘下来递给了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从李鸿章手里接过后，就仔细欣赏起来，李鸿章因为有别的应酬也就没有在意，突然听到一声尖叫。原来，公爵夫人看着看着就把盖子扭开了，将里面的烟灰和污秽物不小心倒了出来，吓得公爵夫人花容失色。晚宴也因此闹得不愉快。事后传了出去，英国上流社会对李鸿章的评价也大打折扣，甚至私下里骂他是一个肮脏的家伙。特别是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对李鸿章这个奇特嗜好非常恶心，他说：“（李鸿章）补褂外面，齐腰系着一根皮制腰带，上面挂着钱包和一些

小袋,袋子里面装着他的扇子、鼻烟以及诸如此类。有一只袋子装的是一个袖珍痰罐,他不时的伸出手取过来向里面吐痰(总督大人清理喉咙和鼻窦时所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声音,闻之者无不后脊梁发冷)。”

六、不顾禁忌随处抽烟

西方礼仪,在公共场所特别是有女宾的场所,男士是不抽烟的。但是李鸿章烟瘾大,在出访欧洲期间,一直随身带着长长的水烟筒,不择时不择地也不管有无女宾,兴趣所致,立即就抽起水烟筒,咕噜咕噜响,吞云吐雾起来。有时抽得厉害了,痰就上来了,也旁若无人地吐一口浓浓的痰。有一次到比利时访问,接待他的是比利时国王夫妇,国王在高大华丽的宫殿进行接待。会谈过程中,李鸿章忽然烟瘾发作,马上就抽起了水烟筒,顿时宫

殿乌烟瘴气。鉴于李鸿章的特殊身份,比利时为了向这位总督大人推销枪炮,只好自嘲地说“抽烟之禁李总督不在此列”。

但是俄罗斯对李鸿章的抽烟陋习却没有这么大的宽宏,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真实地记下了李鸿章的恶习,“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想吸烟。他于是喊了一声,颇有点像马的嘶叫。两个中国人立刻从隔壁屋子里跑来,一个拿着一个水烟袋,另一个拿着烟草,于是开始吸烟的仪式。李鸿章静坐着吞云吐雾,他的侍者们很肃敬地替他点烟,端着烟袋,从他的口里拿出来,又放回去。很显然,李鸿章是想拿这种隆重的排场来使我对他的尊严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不过在我这方面,我也使他相信,我对于所有这些排场丝毫没有在意”。

·解字·

“劲”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这个“劲”本为形声字。丁佛言认为①是古陶文的形体,其左为“弓”(表形),其右为“至”(表声),可见这个字是“以弓圣声”的形声字,表示弓很有力。②是小篆的形体,将“弓”移到“至”的右边,并且换作“力”,有“力”就有“劲”,也有道理。③是楷书繁体字。④为简化字。

《说文》:“劲,强也。”其实“劲”字的本义,并不是指一般的“强”,而是指“强弓”,如贾谊《过秦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弩”是古代的一种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这话的原意是:派虎将执强弓,把守要害的地方。在古书中常见“劲直”一词,那是指刚劲正直,如《韩非子·孤愤》:“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

请注意:“劲”字还可以读作 jìn,如:使劲、用劲、干劲、冲劲、起劲等等。

中国领导人的 “国货”情结



很多中国领导人都有着“国货情结”，曾在国际场合对国货推崇备至……

毛泽东：导演“瓷盘外交”好戏

1951年初夏，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毛泽东导演了一出“瓷盘外交”的好戏。他指示有关部门烧制“水浒故事瓷盘”作为国礼赠送斯大林，要求“高级、特制、美观”，能充分反映中国的“民族特色”。据称斯大林收到整套“水浒故事瓷盘”后，从中读到了毛泽东希望他这个老大哥“替天行道”的弦外之音。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回赠的礼品中包括毛泽东挥毫写下的三个精美的书法条幅：“老叟坐凳”、“嫦娥奔月”和“走马看花”。当时尼克松对这件特殊礼品是一头雾水，但后来有人分析认为，毛泽东书赠尼克松条幅所隐喻的是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因为这些礼物，苏州刺绣也在国际上开始流行，短短一个月内，销量就翻了一番。

周恩来：为国产手表做广告

1961年，周恩来要和彭真等去苏联出席苏共二十二大，这时正好传来上海手表厂研制的新产品“上海”牌手表问世的消息，周恩

来听说后，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在苏联，周恩来戴着“上海”牌手表，心里总有一种自豪感，因为这是块国产表。1972年2月，这块用了十多年的“上海”牌手表表面上的荧光部位已不能发光了，让习惯于夜间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很不方便，他趁着陪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上海参观访问的机会，委托上海市委的同志帮他手表送到上海手表厂修理。

还有一次，周恩来在行政秘书周研森的陪同下，到北京红都服装店做衣服，有关服务人员迎出来，将各种高级衣料介绍给周恩来：“为满足出国人员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周恩来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今后我做衣服，无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邓小平：钟爱“熊猫”牌香烟

提到外交中的国货，人们都会想起那经典的“干杯”。1972年2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向首度访华的尼克松介绍茅台酒时说：“这酒比伏特

加好喝，饮之喉咙不痛也不上头……”

尼克松心悦诚服，也赞扬茅台酒“能治百病”。周恩来与尼克松共同举起盛满茅台的酒杯“干杯”，这一历史性时刻通过中外记者的镜头迅速向全世界播送，茅台酒伴随着这个历史性的“干杯”而名震世界。

此外，让人们记住的还有“熊猫”牌香烟。和国宝熊猫一样，特供烟也被当成外交关系的友好礼物，已故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就定期从中国大使馆收到“熊猫”烟，但他点烟时舍不得一次抽完，经常抽半根，再将另半根放在小药瓶中。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的专访。在言谈中，邓小平一如往常地掏出“熊猫”香烟。华莱士也要了一支，却发现滤嘴比香烟还要长。邓小平笑着说道：“这是专门对付我的。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

邓小平频频在国际场合展示“熊猫”牌香烟，“熊猫”牌的知名度也逐渐扩大。正如美联社报道，中国国宝是熊猫，而中国香烟中的国宝也是“熊猫”牌。



唐太宗与『钓鱼执法』

腐败是伴随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病痼疾。腐败愈演愈烈，必然导致王朝崩溃倒台。因此，历代有识之君都将反腐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并想出不少别出心裁的惩防措施。唐太宗也不例外。

唐太宗即位之初，一方面，由于隋末唐初连年战乱的影响，官员贪污受贿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另一方面，行贿受贿又具有很强隐蔽性，很难被发现。唐太宗想出了一个办法，密令左右向大臣行贿，以此判断受贿之人。不幸果真有一人中招，受绢一匹。唐太宗勃然大怒，下令将其处死。民部尚书裴矩获知事情来龙去脉后，向唐太宗进谏：“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出自《论语》。孔子曾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单纯用政令律法予以约束，百姓虽然遵法却会失去廉耻之心；只有用道德引导、用礼教感化，百姓才会真正归服。

唐太宗的做法，用现在的话说，就叫“钓鱼执法”，也就是执法者在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的情形下，以欺骗手段诱使其做出违法行为，然后对其进行惩处。

钓鱼执法的危害是极大的。首先，执法部门之所以挖

空心思导演钓鱼执法，根本原因在于利益驱动。当执法部门由公共管理、服务部门蜕变为逐利部门，必然会严重损害公权力的形象与公信力。其次，钓鱼执法以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践踏，直接破坏了公众对法律的信守和法治的信仰。再次，钓鱼执法本质上是执法部门对权力的滥用，这意味着公众随时可能被陷于危险境地，必然导致人人自危，对公权力产生强烈的对立情绪。最后，钓鱼执法为欺骗手段披上了堂而皇之的外衣，造成公众与执法部门以及公众之间的相互猜疑，最终将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产生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

正是看到钓鱼执法的巨大危害，尽管已经知道这个馊主意是唐太宗所出，裴矩仍然顶着压力向唐太宗进谏。所幸唐太宗立刻醒悟过来，召集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当众表扬裴矩：“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同时宣布取消以此方法试探官员。

但其实说起来，唐太宗并非钓鱼执法的首创者。在他之前，隋文帝杨坚也用过这一招。当年隋文帝同样苦于大臣多脏污，于是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如有受之者则“立斩”。唯一不同的只在于，当隋文帝出此下策时，并没有大臣像裴矩那样勇敢地站出来向他进谏。

为何同样使用钓鱼执法，却有不一样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说到隋文帝与唐太宗不同的治政理念。

贞观四年，唐太宗曾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何如主也？”房、萧二人回答：“隋文帝勤于为治，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唐太宗却说：“你们虽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

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衍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接着又说自己：“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

应当说，隋文帝亦为一代雄主，但猜忌多疑不能不说是他性格中的一大缺点，刚愎独断更是他作为君主的致命之处。由于自认明察秋毫，隋文帝对大臣一是不信任，事无巨细皆由自决；二是异常苛责，大臣稍有过失即加以重罪，特别是经常于殿廷上杖打大臣，时有大臣因廷杖而死。在这种情形下，即使看到隋文帝有所失误，群臣又哪敢开口进谏？可笑的是，隋文帝有时因妄杀大臣而后悔，又反过来责怪群臣“不谏”。伴君如伴虎，这句话用在隋文帝身上，可谓恰如其分。

相比之下，唐太宗在君臣和谐、同心合力上做得就强多了。唐太宗即位之初，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有重名，即命召见，问以政道。张玄素同样以隋亡教训为鉴，说：“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谏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唐太宗听进张玄素忠告，恪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充分发挥群臣智慧与积极性，上下齐心，共同造就了“贞观之治”的盛况，也使自己成为一代明君。顺便说一下，还是这个张玄素，有一次进谏，竟然称唐太宗不如隋炀帝、等同桀纣。面对如此激烈言语，唐太宗仍然反躬自省“玄素所言诚有理”，下令予其赏赐。如此心胸，天下焉能不治！

由此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回答上述问题了。同样使用钓鱼执法，隋文帝明为反腐，实则将之作为驭下的手段，自然不会去反省，也没有大臣敢于进谏。唐太宗初衷为反腐，待裴矩指出其中弊端后，则欣然接受，当即改正。进而，再以隋文帝为对比，不难发现，贞观年间名臣云集、君臣无间，根本原因就在于唐太宗举重若轻、放手诸臣的治政风格，以及从谏如流、不耻纠错的宽广胸怀。这一点，魏征看得最清醒。当唐太宗有一次表扬魏征勇于直谏时，魏征回答，假使唐太宗对直言谏语恶而不闻、拒而不受，又有谁敢开口冒犯龙颜？并以“善恶太明”的萧瑀为例：“瑀违众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劲，向不遇圣明，求免难矣！”

确实，裴矩关于君勿陷臣于法的劝告对唐太宗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件事过后不久，有人上书唐太宗“请去佞臣”。唐太宗召问道：“佞臣为谁？”此人回答：“陛下可与群臣言，假装生气以试之。有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唐太宗不以为然地说：“君，

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向唐太宗进谏的裴矩。这个裴矩，原是隋室旧臣，为隋炀帝所器重，而他也处处以隋炀帝喜好为坐标，百般逢迎；孰料唐代隋后，特别是在唐太宗时期，却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由佞转直。这个现象甚至引起了司马光的注意与无限感慨。司马光在裴矩谏太宗这件事上评论道：“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动则影随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下级，领导好谏恶谏，则下级必然争拍马屁、不说实话；领导从善如流，则下级就会敞开心扉、知无不言。因此，当我们倡导鼓励干部群众说真话时，领导干部首先要有听真话的勇气和胸怀，特别是对于批评意见，哪怕言词再激烈，也应当有闻过则喜、虚怀若谷的气量与风度。

· 名句欣赏 ·

【义利利义相为用】——《利者义之和论》

相：互相。

【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思堂记》

果：实现。

【人必知道而后知爱身，知爱身而后知爱人，知爱人而后知保天下】——《汉昭帝》

知道：懂得道义。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弘：扩充，光大。

【义不负心，忠不顾死】——《三国演义》

西安市地方志系统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11月28日下午,西安市地方志系统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讲座。邀请了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信访与地方法治政府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大勇,作了题为《严格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的辅导报告。全市13个区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和市地方志办公室全体人员参加。

李大勇教授从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和核心要义、依法行政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和具体要求、对“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具体解读三个方面进行了宣讲。通过学习,与会人员深刻理解了建设法治

国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增强了坚持依法行政的责任心,自觉普法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进一步加强。

办党组要求,全市地方志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深刻掌握精髓要义;要在推进依法修志上下功夫,不断完善地方志工作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全面提升工作的法制化水平;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完成好年度目标任务相结合,细化工作措施,积极主动作为,扎实做好年底前各项工作,确保各项年度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2014年《西安年鉴》培训会议召开

11月25—26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在西安常宁宫召开2014年《西安年鉴》培训会议。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西安年鉴》常务副主编姚敏杰出席了会议,全市年鉴各承编单位分管领导及年鉴撰稿人13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姚敏杰作培训动员,总结2014年度全市年鉴工作,同时安排部署《西安年鉴》2015卷编纂任务。姚敏杰首先回顾2014年度我市年鉴工作,对年鉴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对2015卷年鉴编纂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切实

转变文风,全面真实地记录和反映现实;二是全面落实责任,着力提高年鉴编纂质量;三是确保时限,力争年鉴提前编纂出版。

市地方志办公室年鉴处处长姚文东就“年鉴条目编写”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讲解培训。会议还聘请了渭南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张煜峰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张田德两位专家,分别就“地方综合性年鉴条目编写的规范化”和“编辑工作”进行了生动详细的讲座。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安排合理,内容充实,对提升年鉴编纂队伍的能力水平有很大助益。

《西安地方志编纂志》评审会议召开

11月6至7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邀请30多位省、市、区县地方志专家对《西安地方志编纂志》进行评审。

《西安地方志编纂志》是系统记述上起事物发端,止于2012年底西安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和重要成果的一部专业志书。志稿在全面记述西安方志历史的基础上,重点记述了新编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的历史过程及成果,突出了具有代表性和重大意义的志书,体现了西安地方志事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基本特征。

全志冠以大事记为经,依时代顺序,纵向记述地域方志编纂之梗概,了解历史演变之脉络。接以综述作总体概括,以观志书编纂之全貌与历史发展状态及得失,然后略以大类,按照志书编纂流程、方志编纂成果、年鉴编纂、旧志整理、志书保存利用、方志研究、组织管理、方志人物、志序集汇为序,分10篇横列,详述各事类具体情况。最后设有附录,采集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始文录或资料,以补充志之不足且以证史实。全志为篇章节体,计12

篇、27章、49节;运用述、志、记、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以志为主。除文字记述外,志前附照80有余,且补文字记述之不足。全志总字数110万字。

与会人员经过广泛的讨论、评审,在以下几方面达成共识:1、资料丰富全面,从地记、图经到方志,再到社会主义新方志,纵贯数千年;从市志到区县志、乡镇志、企业学校、村志,从综合志书到专业志书,囊括了各种志种。资料性很强。2、框架结构科学,篇章设置得当。全志分10篇,下辖27章、49节,分类明确,层次清楚,符合志体。3、体例完备,记述精当。较好地运用了述、志、记、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以志为主。4、统合今古,详今略古。清楚记述了方志这个中国独有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起源、继承和发展的轨迹,又对当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浓墨重彩。5、文字流畅,基本精练,行文也比较规范。编纂的同志是下了工夫的,精心设计,广征资料,认真编写,不断修改,才达目前这样的水准。

《西安年鉴(2014)》出版发行

10月,《西安年鉴(2014)》出版发行。

《西安年鉴》是系统记述西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逐年出版,公开发行。由西安市人民政府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承编。《西安年鉴(2014)》是西安第22部综合年鉴,记述时限为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部分内

容数据涉及2013年前。采用分类编辑法,全卷共有类目37个,分目185个,二级分目16个,条目1628

个。详实地再现了2013年度西安市整体面貌和发展状况,为各行各业提供资料参考。



《西安市志》“检察”分篇评审会召开

11月5日上午,市检察院召开《西安市志》检察分篇评审会,市地方志办公室冯艳阳主任到会指导并讲话,张帜副主任、王文振顾问、责任编辑王耀珍,市人民检察院主管志书编撰工作的吕惠萍副检察长、《市志检察篇》主笔、评审小组成员等近20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吕惠萍副检察长主持。

会上,主笔王兵介绍《市志检察篇》志稿编纂情况。各位评审一致认为:该志稿观点正确,内容丰富,全面记载了西安检察20年改革发展的历程。总体质量较好,会议决定该志通过评审验收。与此同时,各位评审还从篇目框架、内容记述、资料核实、行文规范等方面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

最后冯艳阳主任作了重要讲话。她强调,编修地方志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

史。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地方志的表述和批示,为我们做好地方志工作指明方向。她充分肯定了市志检察篇编撰取得的成绩。为做好下一阶段的工作,她强调,确保修志队伍稳定,要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原则,将质量意识贯穿于修志工作的始终。

吕惠萍副检察长做总结指出:《西安市志检察篇》仍需充实、修改。一是保障队伍稳定,保证人员不变,保障修志任务按时保质完成;二是要求承编人员尽快将修改意见汇总,拿出修改方案;三是认真吸纳市志办及各位评审的意见,完成好修改任务,进一步提高志稿编纂质量。

《至圣牛东——牛东村志》 正式出版发行

10月30日下午,《至圣牛东——牛东村志》首发仪式在牛东村小学举行。户县县委副书记李化等相关领导及户县文化界代表出席活动。

牛东村位于户县东部,距县城9公里,南望秦岭,沔河距村3公里。据考证,牛东村史可追溯至元代。牛东自古是操、联、公所、乡的



驻地,商贸、文化发达,为一方政治、商贸、文化中心,有“小北京”之称。

《至圣牛东——牛东村志》全书分十章,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村史文化、民俗与古庙会、名人轶事、姓氏族谱等方面全方位向世人展示了牛东村。

“以人为本”最早是谁提出来的

在中国古代,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公元前 723 年—公元前 645 年)。管仲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在西汉刘向编成、汇辑管仲众多思想观点的《管子》一书“霸言”篇中,记述了管仲对齐桓公陈述霸王之业的言论。其中有一段这样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为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也是以人民为根本的;这个本理顺了国家才

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管仲虽然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人为本”的治国之道,其实,历史上的政治家提出的“以人为本”与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一,在古代,民本思想被视为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的手段,是一种“驭民”、“治民”之术。第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重民、亲民同时又有畏民、愚民倾向,甚至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无知无识的“群氓”,或是供君王驱使的“牛羊”,与民主精神完全相背。

猴年马月确实难等



俗语“猴年马月”是由“驴年马月”衍化而来,二者常被视作同义词。不过,考究其来源,二者还是有不同的。

先说“驴年马月”。中国古代是用十二个地支和十二种动物的生肖来记录人的出生年代。不过十二生肖中并没有“驴”,因此“驴年”成为不可知的年岁,于是有了遥遥无期、不可

能实现的语义。

再说“猴年马月”。古人还用生肖来纪月一正月:万木凋零,虎啸震野,称“虎月”;二月:大地复苏,小草新绿,称“兔月”;三月:春雷阵阵,神龙作雨,称“龙月”;四月:天气转暖,蛰蛇出洞,称“蛇月”;五月:草长莺飞,骏马奔驰,称“马月”;六月:水草丰茂,群羊遍野,称“羊月”;七月:山林树茂,群猴出没,称“猴月”;八月:中秋月圆,杀鸡饮酒,称“鸡月”;九月:秋收时节,养狗防盗,称“狗月”;十月:秋意微凉,肥猪满圈,称“猪月”;十一月:冬雪初降,室内多鼠,称“鼠月”;十二月:寒风凛冽,老牛归棚,称“牛月”。每 12 年才能轮到一个“猴年”,而猴年的 12 个月中只有农历五月才是马月。要等到这一年月,的确是颇费时日。尽管如此,却总归还能等到。这同“驴年马月”的语义显然有别。

古人的 陪客之道

请客吃饭，在中国很早就是
一门学问。要想宾客尽欢，光是准
备了美味佳肴，是绝对不够的，礼
数也一定要周全，才能充分表示
主人的重视和对宾客的尊敬。

古代待客宴饮并不是将酒肴
摆好就完事，主人还要引导和陪
伴客人用餐。宴饮开始之前，要
进行进食的礼仪，宾先主后说一
些互相激励祝福的话，然后再行

祭食的礼仪，以报答先祖，表示
不忘本。凡是熟食制品，主人都
得先尝一尝，以确认食物的口感
和安全。如果是水果之类，则必
让尊者先食，少者不可抢先。宴
席上，客人出于礼貌，往往会克
制饮食，这时主人就应该主动礼
让劝食。宴饮将近结束，主人不
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
食毕才停止进食。

西安市辖县中最悠久的县

西安市辖县中最为悠久的县是蓝田县。
蓝田建县于公元前 379 年（秦献公六年），
“蓝田”之名一直沿用下来，迄今历时 2392
年（至 2013 年），是西安地区 4 个辖县中设
置最悠久的县，同时也是陕西省各县中历史
最为悠久的县。唐代大诗人韩愈，因反对迎
佛骨，被皇帝贬官潮州，离长安行至蓝田蓝

桥驿，其侄孙韩湘来见，韩愈有感赋诗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
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
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
吾骨瘴江边。”蓝桥驿又称蓝关，在今蓝田县
蓝桥乡政府以西 2 公里处。

西安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
市，拥有中国 56 个民族中的 50 个，
汉族占总人口的 98.8%，少数民族
以回族人口最多，占到少数民族总
人口的 75%。人口在 500 人以上的
少数民族还有：满族、蒙古族、朝鲜
族、壮族、土家族、藏族、维吾尔族、
苗族，有些少数民族仅仅几人。据考
证，回民约在唐代就已聚居西安，大
多居住在莲湖区的大小皮院、大麦

市街、庙后街、西羊市、麻家什字、广
济街、桥梓口等地。回族人民勤劳、
朴实，讲究礼仪和卫生，和其他民族
一样给西安各项事业做出了较大贡
献。改革开放以来在饮食小吃方面
尤为突出，如老童家老铁家腊牛羊
肉、老孙家牛羊肉泡馍饭庄、白云章
饺子馆（现已被老孙家合并）、贾家
灌汤包子和许多小食品，卫生可口，
备受欢迎，名闻遐迩。

西安市人口 最多的少数民族

古代官员的 探亲假

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王朝，统治者为了弘扬孝道，专门针对朝廷官员制定了探亲假制度，旨在让官员们“常回家看看”，在父母面前多尽一些孝道。

唐代，如果官员离开原籍远任，在一定年限内便能享受探亲假的“福利”。《唐六典》卷二《尚书省·吏部》载：“父母在三千里外，三年一给定省假三十五日。”这里的省假，即为探亲假。唐代的探亲假只针对离父母很远的官吏而设定，如果官员的父母住在近地，朝廷是不会专门批准探亲假的，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其他节假日回乡探望父母。

唐代探亲假制度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不仅九品以上官员能享受探亲假，即使是不入流的流外官以及在学的学生等人群，也可视情况获批探亲假。此外，为了彰显皇恩的浩荡，朝廷重臣如果要在探亲假回乡省亲，皇帝往往会赐予衣服、茶、药等物，其往来的舟车马，也由朝廷颁给乘坐驿传的“公券”。

元代时，官员私自弃官、撤离职守的情况

比较严重，统治者认为这是没有给官员探亲假所致。因此，元文宗至顺二年十二月，朝廷确立官员省亲制度。该制度规定，官员父母离官员任职地三百里之内，三年探亲一次，假期二十天；如果官员家中无父母，五年给探亲假一次；去探望家族中的其他尊亲，时间为十天。对父母在三百里之外的情况，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据考证，官员依然能获得探亲假，而且时间还会长一些。

为了强调孝道，也为了防止官员利用探亲假任意胡为，元代法律规定，如果父母在外地，官员应当探亲而不去探亲的，要予以追究；官员如果借探亲之名干其他事情，也要严肃处理。

相较于前朝，明代的探亲假制度更为细化和严格。明洪武年间，朝廷规定：内外官的探亲假一律向皇帝报批，皇帝根据路途的远近，确定假期的长短。探亲假一经批准，由应天府颁发回乡证明。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朝廷又作出规定：两京（北京、南京）的文职官员离开老家六年者，经申请，方能回乡探亲。明孝宗弘治年间，朝廷又进一步细化了探亲假的时间，除往返路程外，可给探亲假两个月。违限一年，停俸禄五个月；违限一年半以上，革职问罪。

“压轴”并非“结尾”

压轴是戏曲术语，指一台折子戏演出中的倒数第二个剧目，由于最末一个剧目称大轴而得名。例如，京剧一场戏如果有五出的话，第一出叫做“开锣戏”，第二出名曰“早轴”，第三出称为“中轴”，第四出（倒数第二）

则为“压轴”，第五出（最后一出）称作“大轴”。由此可见，“压轴”与“最后”不是一回事。现在误用倒数第二的“压轴”来称呼倒数第一，不过是约定俗成罢了。



子夜吴歌·冬歌

◎ (唐)李白

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
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
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

赏析

《子夜吴歌》题又作《子夜四时歌》，共四首，写春夏秋冬四时。这里所选是第四首。六朝乐府《清商曲·吴声歌曲》即有《子夜四时歌》，因属吴声曲，故又称《子夜吴歌》。此体原为四句，内容多写女子思念情人的哀怨，作六句是诗人的独造，而用以写思念征夫的情绪更具有时代之新意。

《子夜吴歌·冬歌》不写景而写人叙事，通过一位女子“一夜絮征袍”的情事以表现思念征夫的感情。时间是传送征衣的驿使即将出发的前夜，大大增强了此诗的情节性和戏剧性。一个“赶”字，不曾明写，但从“明朝驿使发”的消息，读者从诗中处处看到这个字，如睹那女子急切、紧张劳作的情景。关于如何“絮”、如何“裁”、如何“缝”等等具体过程，诗人有所取舍，只写抽针把剪的感觉，突出一个“冷”字。素手抽针已觉很冷，还要握那冰冷的剪刀。“冷”既切合“冬歌”，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加强情节的生动性。天气的严寒，使手指也不

灵巧了，而时不我待，偏偏驿使就要出发，人物焦急情态宛如画出。“明朝驿使发”，分明有些埋怨的意思了。然而，她从自己的冷想到“临洮”（在今甘肃临潭县西南，此泛指边地）那边的更冷。因此又巴不得驿使早发、快发。这种矛盾心理亦从无字处表出。读者似乎又看见她一边呵着手一边赶裁、赶絮、赶缝。“一夜絮征袍”，言简而意足，然而随即又情急起来，她想：路是这样远，“寒到身边衣到无”呢？这回却是恐怕驿使行迟，盼望驿车加紧了。“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这迫不及待的一问包含极度的深情与牵挂。《子夜吴歌》中的第三首《秋歌》是正面归结到怀思良人之意，而《冬歌》却纯从侧面落笔，通过形象刻画与心理描写结合，塑造出一个活生生的思妇形象，成功表达了诗歌主题。结构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势突兀，结句意远，情节生动感人。

如果说《秋歌》是以间接方式塑造了长安女子的群像，《冬歌》则通过个体形象以表现出一类人——思妇形象。其语言的明转天然，形象的鲜明集中，音调的清越明亮，情感的委婉深厚，得力于民歌，真是“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篇不可以句摘，句不可以字求”（《诗薮·内编》卷二）的佳作。



青山见我

◎ 田周民

十一月三日上午，二零一四年新任市管领导干部延安精神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行过一个庄严的开班仪式，两辆大巴的笛声就在门外催人上车。十一点五十分，六十名学员赳赳开拔，大巴车如方舟，渡我们出八百万红尘人海，从大雁塔下，也从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旧址门前，北上延安。先到北客站，再换乘西延线动车，十三点五十五分，电子化的现代巨龙扭动龙钟却矫健不凡的身躯，一摆尾便以一百五十五公里的时速逶迤而去。霜降已过，立冬未至，寒气却隐然逼人，可要太阳速敛锋芒，显然也不大可能，今日就是小阳春。也是这个时节，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屈指行程二万”来陕北，是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真理，七十九年后的今天，我们才追慕而去，不是英雄迟暮，亦非浪子纵目，是薪火传承之辈有必要身临其境，拷问灵魂。正是这样一道严峻不容回避的时代命题压在眉睫，才选择在正好醒神的初冬，覆蹈前人足迹，寻觅人生的大路。

一进入渭北高原，只见纷纭杂沓的丘陵先是耸肩探首窥人行踪，大概是解除了心中疑虑吧。很快地，起伏的山势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由少变多，渐成气候。被伊神之力推皱再捏褶的奇峰怪岭，翠微叠加着赭黄锈红的斑斓，

那么热情又豪放地迎头奔来，笑靥刚绽，一个照面打过就彬彬有礼闪去脑后，把欢迎的际遇留给身后的他山别峰。正惶恐造化何以动用如此阵容的钟灵毓秀，作夹道迎接的排场，迎面之山洞然在前，还未及做出反应，已被吞入口中。倏忽再坠幽腹，万马齐喑的呼啸携裹着黑暗的惊骇，瞬间驱走了两侧严整的仪队，惊叹要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一线光明又接引我们向前，终于冲破黑暗，复现初冬的山色在这端列队等候。才要点头致谢，忽又被山的黑口衔住，吞进吐出，吐出吞进，骇然惊愕之际，幻觉是红军当年长征的遭遇，在这一刻要让后来人以别样方式经一番心惊肉跳的体验。然而我们还是幸运，红军的苦难辉煌可以想见。而当年，向北寻路的三万多名热血青年要到延安，就须先从四极八荒云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这段苦觅的时间若略去不计，仅从“八办”北上，闯白区，翻峻岭，涉河越隘，迂回周旋，六百里的险途即使幸运通过，也需三十多个昼夜兼程的苦旅。今日，我们驭龙一啸，“穿山甲”再施土遁缩地之术，两小时又十分钟便龙潜延河，宝塔在望了。

终于投进了延安的怀抱。天公作美，晴朗不见一丝云彩的天空，让人的遐思立即接上《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那歌的余韵。站在

延河畔上，一泓幽秘的碧水从远处而来，四围的青鬃翠髻，在虚空与幻水之间，忽焉而隐，忽焉而现，稍一分神，就换了容颜，除非你有足够的定力捉住她多变的倩影。待幽水碧波接住落霞的余晖，销金溶溶、碎银点点，眼前又一番绚丽迷人的景象。不久，崦嵫国的炼丹炉火尽烟息，夜幕来施障眼法了。不过，神工的魔力有时未必抵得住人工的机巧，一转眼工夫，华灯似山魅水仙梦醒，亮起无数灯光闪闪，无需怀疑，应是“银河落九天”。这时候站在宝塔山的半腰，你一定看清了延安的玉颜。因为灯火把市容的轮廓勾勒成一个大写 Y 字，南来的是南川河的川流不息，西来的是延河的延绵不绝，而两河不知是相约于盘古还是禹帝，竟那么巧合于宝塔山下，似乎那座宝塔伫立于此，专为见证它们的合流相济而诞生，以至永恒。日落前还清幽脉脉的软波，这时候尽在橘黄、姹紫、祖母绿、宝石红中变幻着丽影。而灯光疏离的辽阔处才是隐而未退的青山，夜幕下的四围山色如水墨丹青泼于天际，依稀指顾的宝塔山耸于东南，凤凰山盘于西南，而北边，全然是清凉山的领地了。这时候，山已不再是山，水也不再是水，是人杰地灵相缪着，把千古的向往在这里聚成一个永恒之谜，再交予合而为一已经有了声势的延河，由她义无反顾地朝着东北的方向一路奔去。举首是山，俯首是水，不知究竟是谁围着谁。山外的时局变幻如棋局，楚河汉界，斜马直车，数不清换了多少场面，唯巍巍宝塔屹立山头，唯滔滔延河抱定一个目标，要去罗子山的“天尽头”汇入黄河，归于大海。

遐思逐着延河流入梦境，睁开眼时，朝曦的神来之笔已以宝塔山为画布，将金黄与苍青和谐成巨幅油画，几乎占去了大半个湛蓝的天幕。那着了金装的塔影，镇压在上，是要做太阳神的印章，还是要抵挡寒风肆虐，怕吹皱它庄严的布局？

该是延河饮马的时候。我们简单用过早餐，便列队沐进现场教学的课堂。可能是红色教学点的氛围始然，耳畔隐隐闻得《长征组歌》的旋律，也似延河的涛声，由远及近，漾进耳膜。这歌声，由陕北大地回荡到九州云天，七十九年过去，依然回肠荡气，撼人心魄。歌声中，似看到了一个伟大的身影，拄着井冈山的毛竹，四十二岁的毛泽东带领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三过草地，攀岷山，越六盘，终于结束了腥风血雨的长征，向这里走来，来到了延安，而且一驻足就是十三个春秋。等到他再转身辞去，已“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然而今人不解古时谜，这一片土地何奇之有，让一个诞生不久的幼年党不惜跋山涉水，前赴后继，一路寻觅到此？就是这么一个谜，让多少豪杰义士大惑不解，即使外国友人欲远播其闻，也只能以《西行漫记》这样的手法来直陈，仍无法揭开谜底。至于敌人，就只剩在咬牙切齿中怒其“费解”，恨其“怪异”了。其实，路在脚下走出。橘子洲头那少年，逐浪一去，拄竹前行的一刻未必胸有成竹，但他抱定了一个信念，要“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于是向天长啸，敢问江河悠悠，谁堪载此舟？赣江淌过，黄浦江试过，金沙江也涉过，甚至连乌江天险也探过，可泽国水乡，遍问滔滔江流，一问，滔滔；再问，默默。唯古时肤施，当代延安，像北方汉子的性格，在黄土高原的沟壑腹地毅然解开胸襟，将一腔热血澎湃成延河的激流，一河不足，还邀南川河来鼎力，要承载还涡漩于嘉兴南湖的那一叶扁舟去相约黄河，归流大海。有识之士似窥出一线天机，慨叹：“天下人心在我，逆水而上也顺风。”言者无意，闻者有心。可是，等闻者从楞怔中觉悟，天河倒悬，乾坤逆转，那一叶扁舟真就扬帆起航了。从前，总在听高台上“载舟覆舟”的教化，可一朝亲炙滔滔延河水，“水”和“舟”的大道理一概再不悦耳。有谁自作聪明说破它，只

能徒招侧目。因为，生动不过眼前这清流悠悠，樯影幢幢，一任远接天际。

延安岁月的黑白片在快速倒带，辅导老师似乎瞬间里要将十三春秋的故事全告诉我们。遗憾耳孔太小，目又不逮，更懊恼大脑神经捕捉不及，辅助之笔也相形见绌。只好向现场的真情实景窥探片段的剪辑。

吴起这片热土，印证着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一个足迹，可其时，范文正公在九百年前巡边时所吟唱的“远怀忘泽国，延安胜可游”的景象已不复在，取而代之的是清末朝官来巡抚时的疮痍满目，《七笔勾》之“一勾”就有这样的句子：“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稠，山花无锦绣，狂风阵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就在这漫漫长夜盼天明的渴望中，红旗飘来，天兵突降。当老百姓从惊愕中明白过来这是“咱们的队伍”时，欢喜之情油然而生。千家万户把门开，把咱亲人迎进来，热腾腾的油糕端上桌，香喷喷的米酒捧给亲人喝。可是忘情的老百姓大概没有去想，热情好客要以囤满釜盈为前提，因为那时，庄稼的亩产也就五六十斤，还是一年一料收成。数以万计的军队，还有上万匹战马的草料供给，耕者为炊已难，口中分餐何堪？很快地，军民生活难以为继，而且，民怨之声渐起，继而有了骂声。毛泽东万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声音，就到当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原来，前一年征军粮已达九万担，老百姓吃不消，这一年因队伍壮大增至二十万担。尤其“七七事变”后，可喜的抗战局面惨遭破坏，国民党顽固派集中兵力，构筑了北接长城，南沿泾水，东临黄河五道封锁线，企图截断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边区的联系通道。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严密监视，搜查来往行人，封锁进出物资，意在将边区军民困死、饿死。就是这样的人祸加着天灾，老百姓岂有不骂之理？听到这儿，他一挥手说，这样搞得天

人共愤，怨声载道，不行，得想想法子：“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于是大生产运动开始了。毛泽东在赶走日寇、打垮国民党反动派之前，先来征服南泥湾的山岭沟壑，修筑共产党军队与人民之间的桥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泽东发动了大生产运动，他自己在杨家岭窑洞前开垦种菜，也传为佳话。大生产、大丰收，累累果实不仅填饱了开荒者的肚子，还让老百姓锅稠碗满。“天下哪有这样好的军队！”此声发端于民间，变化亦惊现于瞬间。举目再望，《兄妹开荒》召来多少青年男女，《十二把镰刀》的故事更鼓舞了士气，《王桂花纺线》，不比前线英雄，也要做劳动模范。连《梁秋燕》也提篮剜菜送军营，虽然说野菜儿不出钱，是娃娃们心一片。天下归心，人心所向，这张照片就把一个感人场景合盘托了出来。一面“人民救星”的牌匾几乎把其中的人物全挤向一边，戏剧性的变化是，赠匾者居然是曾有“怨言”的群众，而受匾者正是融进秧歌队中的毛泽东。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情感升华到如此境界，连小脚的大娘也不甘落后了，她们上不了前线，就争着来做军鞋，有人一年曾做过九十二双的奉献。送子送郎从军更是争先恐后，别时情景不仅从现实歌颂到舞台，再由舞台唱响到军营。青铜何幸，你看，延河畔那对牵马相依、低语缠绵的小夫妻，把含情脉脉的别时一刻尽托它凝固成壮丽的永恒，由宝塔来见证，让延河去颂扬。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循着那雄壮的歌声，不自觉跟着节奏而去，就到了“抗大”旧址前。并不大的几个展厅，里面竟有那么多故事让人着迷，还有那么多旧照、实物也让人目不暇接。那一个个目光炯炯却形销骨立的红军官兵，谁看一眼

都会把草根树皮归咎为原罪之一。可红军还是感激着天地之灵，草根树皮毕竟让他们抗拒住了围追堵截、置之死地的厄运，终于摆脱了魔鬼，走入了人境。既然命运如此“惠顾”，体质的补养已非首要，精神的补给该是当务之急。抗日军政大学便应时而生。所谓大学，教官是兼职，教师也是兼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都是兼职教师，连时任校长的林彪也既要指挥平型关大捷那样的战役，还需履行校长的职责。而教室，更是由学员们在山上凿洞为窑，开山为路，向天宣战，无中生有。无需指认，你就从照片上看得清楚，学员们石块为凳，膝为桌，树枝做笔，地做纸，甚至行军操练时，前面学员背一块小木板，就当后面学员的黑板用。至于洗漱，延河是共用的面盆，更是女学员的临水梳妆的宝镜，背过身去，徒增男学员无限漪思。听那湘音楚语，不用猜都知道是毛泽东在作点赞，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行，了不得的。果然就是了不得，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方针指引，就是这样一所大学，长则一年，短则半载，压茬办了下来，竟也培养军中人才十余万。这些官兵走出校门，上了战场，初交锋，敌不肖；再交手，敌震惊；三交战，敌人不但大骇，而且闻风丧胆，成了“纸老虎”。以至后来，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竟厚颜要跟“八路”谈生意，开价是，用二十个日本兵换我一名抗大学员，或五十名日本兵换一名抗大军官。可想“谈”就谈得了吗？他没想过，单相思，徒增无趣。我还是不禁回头，从心灵深处向归于橱窗档案的日式枪炮发问：“可能吗？”枪炮哑然不语。不语，我也揣得准你惊悸不齐的心律。不信，你且听冈村宁次在恼羞成怒后向“抗大”发出的狠声：“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可惜，他的话音未落，自己反被押上了正义的审判台。

一路红歌相伴，一路音乐醉人。唯到了“七大”礼堂前，一切归于寂静。走进会场旧址，相叠在伟人的足迹之上，立即感到有踩肩而立的惶恐。“七大”旧址，礼堂里鲜红的旗帜似火，烘托着“朱毛”肖像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会标，把六十九年前那一场盛会的背影留给仰慕者来目瞩远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横幅更突显出盛会主旨，让已不敏锐的神经为之一束。小心地坐在涂抹了太浓岁月痕迹的木条椅一角，似乎伟人的余温还感受得出。辅导老师临场授课，再辅之以旧照解读，让人的思绪不自觉就溺进历史的烟海。这个诞生于“五四”风雨中的幼年党，自一九二八年召开过“六大”后，十七年来就在迷茫中寻觅出路，异常紧张而激烈的战争环境让她在襁褓中饱受恫吓，寻觅中“左”风右雨又夹击来袭，小胜之喜与大挫之悲的经验教训还来不及总结思考，一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册子，着马列经典词句之原色，挥共产国际指示之大旗，“定向”似的来障目塞听，眼看“左”岸之左的巨浪滔天，大有灭顶之势。毛泽东以惊人的洞察力挺身而出，要屏住，要喝退这汹汹来潮。一个《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先拉开延安整风的序幕，也似大堤高筑，使呼啸而至的“左”潮即使拍岸冲天，也只能挫败而跌，归于静寂。再以巨人的毅力把这个沉浮不定的党引向沙岸，渐近坦途。随后他就疾呼“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并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三大任务。还借用《笑林广记》中的故事巧喻教条“左”倾之危害：说，有人举竿进城，横竖无法以入。正恨竿长门小，接踵而至者笑曰，拙行笨脑，何不斫而入之。持竿者愧然，折节得入。隧自鸣。毛泽东说，党内举竿进城之人自是可笑，而自以为看出了“门道”者更是为数不少。

教条搬用让我们吃尽苦头,何不猛醒过来,顺拿着竹竿做个出入自如的人呢?舟横沧海,人在迷途,一旦灯塔在望,逆水而上也只是挥棹摇橹的力气问题。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五四”以来又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的星星之火,自延安点燃,迅速遍及各抗日根据地,遂形成燎原之势。不仅烧掉了党内长期以来教条主义的束缚,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拓了出来。继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传统便成为自此之后乃至未来振我雄风的强大理论武器。接着七中全会召开,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这个党就走出了迷茫,跃出了苦海,一个举旗人也就高举起自己的旗帜,站在一百二十万党员,九千五百万解放区民众的中间。此会开过三日,一场让全党等候了十七个春秋,筹备了四年的“七大”向世人宣布,在延安召开。其时的会场,正是我们今日僭用了的这礼堂。站在这里,似乎听得见历史的回音,以至于那支春秋鼎盛的队伍在高扬的旗帜下,震天号角伴着铿锵启程的步履也踩破了黎明前的宁静。岂料这脚步声惊动了委员长的酣梦,他这时候才明白:“现在全国士气低沉,但‘共匪’增强,到今天还能‘苟延残喘’,其力量是由于整风运动而发生的。”还好,这话不是复梦中呓语。

“麦苗儿青、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何处飘来这悠扬婉丽的歌声,不由人要顾盼张望。细心的辅导老师窥透我们的心思,委婉相告:“演唱者你看不见她,可朝前走,用心,说不准你就能跟主席打个照面”。延安人民善以“主席”这职务的称谓表达对伟人的阶级情感。这话给迟疑者一个惊喜,让游走不远的灵魂附体归窍,待气氛活泛起来,她接着说:“因为那十三年里,主席一直就在咱们农庄,你瞧,那一片菜地,就是主席当年带头

开荒的真实写照,冬去春来,花开花谢,杨家岭不会忘,这块地也记得清”。顺着她的指向望去,挂着“杨家岭毛泽东故居”木牌的窑洞左下方果然是一畦菜地,所种之物已被收获,可敞开胸襟的土地更见包容。热情的辅导老师指着那一畦菜地说:“明年秋天若能再来,主席这菜地的丰收景象不仅饱你眼福,鲜蔬珍味也会享你口福”这话出她甜美清丽之口,满场的笑声里也似弥漫了农家乐的气息。“别笑呵,看看这面石桌,它的故事会更让你感兴趣”。见大家听得投入,笑得开心,她话锋一转,目光和脚步都移到窑洞口同是用石块支起的小石桌前:“你看,主席当年的会议室加会客厅也在露天。”她用口中的娓娓活现出眼前的历历:那时候,五大书记总在这儿讨论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爱国人士曾心存疑惑来这里要亲睹它是不是一个传说,外国友人更有追慕而来者,要用西人的身体触摸一下这石桌的温度。而延安的老百姓呢,不仅跟主席连畔播耕,出入来去路过这儿与主席挥手点头打招呼早已司空见惯,被主席邀来一坐,或拉家常,或叙衷肠也不稀罕。顽童无忌,不知哪一阵会追笑而止,非但不怕主席喝退他们,甚或要缠着主席讲古时三国、今日战事。请看,这一张照片,两个“红小鬼”就傻笑着挡住主席去路,要主席给他们教“毛泽东”三个字该怎么来写,而主席竟答应了,还倾着身子,用右手食指在左掌心上那么耐心比划,教给他们。再看这一幅,窑洞前,石桌旁的主席举目远眺,在关注前方的什么。一只芦花鸡觅食到此,从容胜似闲庭信步,也入了镜头,走进历史。史料记载,外国友人斯特朗从地球的那边万里而来,主席就在这石桌前接受了他的采访,黄发碧瞳的洋人自然惹来一群顽童挤上窑坪看稀奇,主席一眼就看透了孩子们的心事,抛一个微笑先给他们,再起身一个“请”字的手势,跟客人换过座,正好让碧瞳高鼻转过

来给孩子们看个够。斯特朗怎见过村童无视“要人”的场景，摊手就问“怎么回事？”主席一摆手说：“尽管放心，那是我的小邻居，好可爱的，不碍事。”一个涉外活动就这样被主席轻而易举地化尴尬为趣谈。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也是主席招待过的贵客之一，餐桌就是这石桌。盛宴呢，是主席从亲手开垦的菜地里摘来的鲜蔬，而米酒为邻家大嫂所酿，酒杯则以粗瓷大碗所代，举杯，不，举碗，碰碗之际，主席笑着说：“你来延安我很欢迎，我没有什么东西款待你，就尝尝我种的蔬菜吧。”不料，陈先生夸赞饭菜鲜美胜过山珍海味。问主席：“这顿饭能花多少钱？”主席说：“大概就两毛多吧。”陈先生一怔，继而点头叹曰：“委员长八百元一桌饭请我，我尚未赴宴，你两毛钱的鲜蔬家宴我竟找上门来。”说罢双手举碗就敬主席。后来的会谈还在这露天的石桌前，那么多高层人士和远道来客谈兴正酣，一位小战士大概送来什么急电吧，小跑而来，递过信函，可能要等候主席指示，竟侧身挤坐在主席身边的长凳一角。这一幕让陈先生看得目瞪口呆。会谈结束，朱总司令陪同陈嘉庚到“抗大”三分校视察，当时学校正在举行篮球比赛，学员们一见到总司令就高喊：“总司令，来一个！”其时已五十四岁的朱老总爽快地把外衣一脱，笑呵呵跑进球场，一会便投进四个球。陈先生见状，感慨万端，啧啧叹道：“贵党上下平等，亲密无间，这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呀！”延安之行，陈嘉庚眼界为之一开，他曾说过这样一番话：“重庆有官皆黑吏，延安无土不黄金。我未来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其实，中国的‘救星’早就有了，此人已经四五十岁，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大事，此人现在就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据说这话很快传到山城，惹得委员长比周瑜还生气。不愧是延安窑洞前成长起来的红色教授，她讲得动人，我们听得过瘾。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又是洪钟般湘音楚腔在响遏行云，回荡空谷。细听远观，这声音似从前面那通鎏金闪烁的石碑间流出，而一座花岗岩的雕像就耸在右侧，非仰止不能细瞻。背景是青山，雕塑是白石，工艺精湛造型逼真的塑像衬着那主调黛青、杂着橙黄枫红的斑斓的山景，相映之下，一股浩气迎面拂来。仰慕迎去，远远就看得清这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挎着枪，背着一捆什么？木炭。前脚已经踩上高坡，后脚正要跟上，兴冲冲、急匆匆是要去汇报烧炭的成果，还是去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把自己的赤诚化作窑洞里的炉火？毋庸置疑，是张思德。而左侧的那座碑石所勒，正是毛泽东在追悼这位普通战士时的即兴讲演，标题就是《为人民服务》。张思德是怎样一位英雄？从背诵《老三篇》时代过来的人都熟知，他是中央警卫团一名战士，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因烧木炭的土窑坍塌，不幸殒命，年仅二十九岁。他的牺牲并不比倒在枪林弹雨中的战士更为壮烈，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度关注。噩耗传来，毛泽东非常难过，说“前方打仗死人是没办法，后方生产劳动死人是应该的”，并吩咐“一、要把张思德同志身上洗干净，换上新衣服；二、搞一口好棺材；三、要开追悼会，什么时候开，告诉我，我要参加，要讲话。”结果，追悼会那天，毛泽东真的来了。一张依稀难辨的照片仅能从山头追悼现场那位微微前倾的轮廓上指认毛泽东的侧影，而“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横幅挽帐搭在土坡上，却格外醒目。透过雕塑，透过石碑，稍一走神，就走进那张定格在历史档案的照片里。隐然，似看得到张思德脱下鞋，夹住机要信件在大雨中光脚板疾走的步态；看得到，为部队买猪时主人家的猪仔一不留意钻进猪群跟随而来，

张思德半途发现再送回去的场景；还看见他当了班长又回战士岗位时干脆的敬礼。就是这样一位再平凡不过的八路军小战士，用他的行动阐释着人生的价值。透过幢幢人影，更听得见伟人的哀悼声：“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抗战就要一决胜负的紧要关头，毛泽东竟如此对待一位普通战士的牺牲，或许有人就在心中质疑：“值得吗？”毛泽东当然要打消你的疑虑：“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这声音在山谷激荡，叩击着人的耳膜，也拷问着心脏。伟人、战士、勤务员，一瞬间都搞不清这一堆名词的本质区别了，甚至连“我是谁？”也得低下头，细思量。不光是我，还有同行。

思绪绵绵，浮想联翩。哀悼的讲演何故牵扯出一个“李鼎铭”来？辅导老师娓娓道出此君背后的故事，更有嚼头。因为，在今日的中国版图上，你无法找到“陕甘宁边区”这样一个确切的地理位置，可历史上的中国共产党却在黄土高原的那一角，以延安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红色政权。而且要在这区区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开始对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出历史大剧进行“彩排”，总策划就是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设在延安。接着就颁布《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建立了“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选举制度。一九三九年元月，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实现了由苏维埃民主制度到民主议会制度的转变。然而毛泽东还是感到中共党员比重过大，他认为，这不利于团结各阶级和各阶层人民，孤立反共顽固派，达

到共同抗日目的。故于一年之后便在陇东、绥德一带探索“三三制”的做法。何谓“三三制”？即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在人员分布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无产阶级和农民；非党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到了一九四一年元月，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就发出《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并由边区政府带头实施。一时间，引起社会各界热议，最为激动的当属开明地主和绅士，他们盛赞“三三制”的做法体现了共产党的“宽宏大量，仁义治国”。可刚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翻了身的群众却有“敢保不受二茬罪”的担忧。毛泽东是怎么看的呢？他说：“现在大敌当前，只有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和阶层，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虽然只占有三分之一，但党有很高的威望，一定能，也必须保证在政权组织中的领导地位。”这样，到年底，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就顺利举行。在开幕典礼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员对党外人士有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这是七十三年前响彻在延安上空的一个由党的领袖来阐述党的宗旨的洪亮的声音，这声音穿越时空，在今天听来依然亲切。而就在这一次会议上，掌声的巨浪声中，一位瘦小驼背的老人扶杖走上主席台，递上了“精兵简政”的议案。这位扶杖提案之人正是李鼎铭。严寒天的会场上，毛泽东一边在手上哈着热气，一边细心地翻阅这份议案，他将“在今日困苦，资源薄弱的情况下，欲求……”一段话用红笔圈了起来，再抄录进自己的本子，回味再三之后，毛泽东在上面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听取了李鼎铭作完解释性发言后，还推心置腹地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位米脂的名望绅士，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句忧国之言，竟让领袖如此看重，更没想到的是在得以垂顾举荐之下，自己还在本次会议高票当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爱国情怀犹盛，又获如此殊荣，李先生开完会议，就回家乡，先捐献了全部家产，再只身来延安就职。毛泽东听此消息，亦喜亦忧，派人把他接到杨家岭窑洞，关切地说：“怎么都捐了呢，还是给自己留一点吧！”“留一点有甚用？我人都是国家的。”李鼎铭倔强地说。毛泽东听后抚掌而笑：“人都是国家的了！哎呀，你真是一个开明人士！”“绅士”改“人士”，一字之别，彰显出毛泽东对眼前这位爱国人士的欣赏和尊重。这件事当时不但震动了整个边区，也让外边的世界感到惊诧。一位外国记者就曾怀疑共产党的“用心何在”，专程来采访李鼎铭，可得到的回答是：“我一生不参与政治。我年纪大了，但在紧急之秋的一九四一年，我接受了本县推选，当了边区参议员，然后由参议会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我对新民主主义的信仰，是在我服务政府的四年中，证明是正确的……我想让重庆知道，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绅士会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休戚相关，并且以边区为骄傲。”这一番坦言，重庆那边的反应自不必说，这位记者着实在失望之下大吃一惊。

王家坪，窑洞南侧，一帧尺五见方的黑白照留人脚步，是毛泽东、毛岸英父子并肩而站的那张常见照。因为照片较大，猛回首，还以为这父子二人在等我们前去做什么交待。父亲的面容憔悴，严肃中透着慈祥。儿子呢，似有点拘谨，可眼神却泻漏了心中的秘密，喜悦与激动，任他微颦，也关不住憧憬未来的窗

户。而我，在六目相接的那一瞬，神经不由一紧，忽然想起“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这两句诗来。这是古时一对父子刑场离恨之遗句。“莲”谐“怜”音，“梨”取“离”义，一吟，苦酸之感就泛出心底。八年抗战庆其胜利，重庆谈判却哀其流产。此时的毛泽东大病一场，几乎坍塌而倒，照片上的倦容该能说明这一点。那时延安的医疗现状，即使华佗再生，扁鹊转世，手中无药也徒然枉然。斯大林惊悉共产国际一角的中国领袖身染沉疴，来伸手相助，毛岸英就兼做苏联医生翻译而回到父亲身边。毛泽东与杨开慧生育三子，井冈山的艰苦岁月，长征路上的跋山涉水，失去了母亲的三个孩子扑不进父亲的怀抱，就流浪到街头，也还是孩子，这大哥怎能承担起长兄比父的重任。先是小弟丢失，再是二弟被打致残，就连他自己，后来也是组织四处寻找，才送去延安再送到苏联。那时一别，父子今日再相见，春秋已历十九载，十九载，悠悠天地间将发生何其大的变化。昔日的鼻涕小子，今日已高过父亲的头；街头浪子，也出脱成留苏学生。英俊帅气，活泼智慧，自然是最能安慰父亲的礼物。可久别一见，小住两日，父亲就让他去了老百姓中间，开荒种地、农村调研、工厂学工、机关锻炼，几个月下来，一个文气又洋气的帅小伙就变成脸色黝黑，两手生茧，有点土气的“傻小子”。他所接受实践锻炼的环境中，无人知晓他的身世，中央机关的人却有点不忍，可是经不住毛泽东一摆手，毛岸英的“忙”谁也就无法再帮。直到新中国成立，才说是进了京城有了着落，不料朝鲜战争的硝烟又吹到家门口，抗美援朝开始了。毛泽东决定让儿子抗美援朝去。主意是主席定的，参战的将军却无人忍心带上这个孩子，他们哪一个不晓得，为了这一天，毛泽东已丧失了六位亲人，何况这一去又是一场恶战，都劝毛泽东留下儿子在身边。可毛泽东却有自己的想法：“抗美援朝是我主

张的,好不容易才统一了思想,作出了决定,我不让岸英上战场让谁去?”别人还要开口,毛泽东背过身子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真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毛岸英成为第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然而绳子总从细处断,不幸毛岸英捷报未传身先死。噩耗传来,多少人为之惊泣,做为人父,此一击,可以想象,毛泽东是怎一个肝肠寸断。然而,当总司令彭德怀专程回国陈情,毛泽东却没有半分责备,反来安慰他放下包袱,轻装再回,把美国佬从朝鲜赶出去。心在滴血却来安慰别人,这该有怎样一种胸怀。当时有人提议把毛岸英遗体运回来安葬,毛泽东又断然拒绝。他说:“岸英是个好孩子,他为保家卫国牺牲在朝鲜,可战场上有多少战士已经捐躯,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他们的父母也都忍受着失子之痛,如果把岸英运回国来,我如何向那么多失去儿子的父母交待?就让他留在朝鲜吧,和那么多牺牲了的志愿军战士在一起……”从此,毛泽东就和他这个儿子隔着鸭绿江,再隔一层阴阳,相望两茫茫。都说伟人不重儿女情,可时隔二十六年,伟人辞世,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打开一个一直被毛泽东携带在身边的包裹,一霎间,目睹者全都潸然泪下,原来包中之物是毛岸英的一顶军帽和几件衣服。“怜子如何不丈夫”。看看一代伟人义之所取,情之所系,情何以堪?也许是辅导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解带我们走得太深,也确实是在照片背后的故事感人至深,我们一大片全都肃立、鞠躬,为之鼻酸眼热。

延安,十三年一幕史诗,我们实在无法全观,却总想觅到蒋介石在延安的蛛丝马迹。咦,有了,时间就是一九四七年初春,那场战略大转移。炮火似乎做了惨烈的背景灯光,胡宗南、刘勘先上来亮相。因为那一阵毛泽东已经作出了“撤离”的决策,料就胡、刘要得意登台了,于是告诉大家,站高一些,要从战略的

长远去看胜负,不能以一时的进退论英雄。我们要撤离,让敌人攥紧拳头进来,却没有力气可使,等他们松开了手,我们好一个一个剁掉他的指头,让他们哭嚎着自己跑掉。浪漫的领袖,诙谐的语言,撤离延安,如此一项重大战略计划的实施,经他之口,传神就如游戏般好看亦好玩,实际上他也就是这么做了。巧的是,毛泽东转移陕北的步子刚起,胡宗南迫不及待就来,而且带了三四个旅,二十三万兵力。十倍于我的威慑力该够自信,可我驱于前,他追于后,我绕向东,他追向西,神的是,我可远眺他尾大不掉的阵容,他却无法窥见我矫若游龙的行踪。气昂昂紧握的双拳即便让掌心冒汗,也无处可击,气急败坏之下,抓来明知留住过我军将领的大爷来喝问,穷黔只剩要伸手到口中掏出话来。空城一座,空跑一趟,不甘心啊。怎么办?以谣言混淆视听,也壮一壮自己的威吧。就放出话来,说毛泽东已经失踪,下落不明;周恩来也身负重伤,插翅难飞。至于那一支溃逃的匪部,当然被赶尽杀绝,只等委员长来延安城阅兵庆功了。结果,委员长还真就来了,不过他倒是心存疑惑,“共匪”难道就如此不堪一击?疑归疑,眼前的现实却千真万确。没有了共产党的影子,他便放下下心来,要深入民间,去倾听疾苦。当得知“为人民服务”竟然是毛泽东赖以立足延安的秘笈时,也立即在延安的空城里宣布:党国决不输给“共匪”,将实施“为人民忠诚服务”的主旨。有点“智叟”占口的味道,多了“忠诚”二字,“服务”的含金量就高出一等吗?好笑还跟着成立了一个“为人民忠诚服务”办事处,赫然挂牌昭告天下。办完这些事,他就去杨家岭、枣园、王家坪,要实地看看毛泽东和“共匪”是以怎样的生产生活方式支撑自己的信念。据说他对大生产运动颇感兴趣,见窑洞前有一辆纺车,也坐下来纺线,嗨的是一条线拉到半途崩然而断,他一怔,不祥之